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與俄羅斯之觀察（1995~2005年）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Breakdown: Observations on Russia and Taiwan (1995~2005)

doi:10.30390/ISC.200611\_45(6).0002

問題與研究, 45(6), 2006

Issues & Studies, 45(6), 2006

作者/Author：李西潭(Yeau-Tarn Lee)

頁數/Page：33-7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6/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611\\_45\(6\).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611_45(6).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民主鞏固或崩潰： 台灣與俄羅斯之觀察（1995～2005 年）\*

李 西 潭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 摘 要

台灣與俄羅斯都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時，從威權或極權政體走向民主政體的國家。然而，兩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卻有截然不同的結果。本文的主要目的，乃是在探討 1995 年至 2005 年之間，台灣與俄羅斯在民主發展上的異同。首先，針對民主鞏固之概念作概括性的整理與解釋；其次，說明台灣與俄羅斯民主發展之過程；接著，以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的模型，深入比較台灣與俄羅斯民主化進程之差異；最後，則進一步提出台灣邁向民主鞏固與俄羅斯發生民主崩潰的觀察。

**關鍵詞：**第三波民主化、民主轉型、民主鞏固、民主崩潰、台灣、俄羅斯

\* \* \*

## 壹、前 言

二十世紀末期，人類政治史上最特殊的政治現象之一，就是所謂「第三波」（The Third Wave）民主化的浪潮襲捲全球。<sup>①</sup>第三波民主化自從 1974 年在葡萄牙展開之後，至今已經超過三十年。相較於 1974 年時，全球只有 39 個民主國家，在著名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於 2005 年底公布之最新世界各國自由調查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全球 192 個國家之中，「選舉式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共有 122 個，其中包括了 89 個「自由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同時也是自由的國

---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主辦的「台俄民主鞏固與深化：普欽與陳水扁總統第二任期面對的挑戰與契機」學術研討會，台北，2005 年 5 月 7 日。

註① 請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3-26.



家；其餘 33 個國家則被評定為「部分自由」。<sup>②</sup>其中，台灣與俄羅斯都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時，從威權或極權政體走向民主政體的國家，但是兩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卻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前者雖然荊棘滿佈，卻繼續往民主鞏固的方向發展；後者雖曾曙光乍現，但卻面臨民主崩潰的挑戰。<sup>③</sup>而造成新興民主國家之間民主發展不同的原因，乃是一項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

儘管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使得新興民主國家急遽增加，同時也使民主政體成為當前最主流的政治型態，然而，在這波民主化啟動三十年之後，卻呈現所謂退潮的現象，新興民主國家的擴增也已經緩慢下來。政治學者們所關注的焦點，正逐漸轉移至民主鞏固之上。<sup>④</sup>然而，究竟什麼是民主鞏固呢？儘管民主政治與民主化的研究變成「真實成長的工業」，晚近關於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的研究更是當代的顯學<sup>⑤</sup>；正當任何人都可以用他們喜歡的方法來詮釋、使用民主鞏固概念之時，卻沒有人能夠明確道出此概念的真正意涵。「鞏固學」(consolidology) 成為一個不清楚、不一致、無限制的概念。<sup>⑥</sup>因此，本文首先將對民主鞏固的概念，作一概述性的討論與整理。

台灣啟動自由化的時間點，約莫是從 1986 年民進黨成立或 1987 年蔣經國總統宣佈戒嚴令解除開始；繼而經過 1991、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和 1996 年總統直選以後，成功完成了民主轉型。而後，台灣又於 2000 年通過民主鞏固第一階段的考驗，人民用選票完成歷史性的政黨輪替與政權和平轉移，這不僅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全球華人政治社會劃時代的里程碑；不只是亞洲民主化經驗亮麗的表現，也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成功的案例之一。<sup>⑦</sup>

相較之下，同樣受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鼓動，由社會主義極權專制政府轉變成為民主政府的俄羅斯，在民主道路上似乎遇到更多的阻礙與困難。1991 年 8 月，蘇聯發生了流產政變，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 (M.S. Gorbachev) 雖未被推翻，但是莫斯科的主控權已從蘇聯政府轉移到俄羅斯聯邦政府。俄羅斯聯邦總統葉里欽 (Boris Yeltsin) 解散了蘇聯共產黨與俄羅斯共產黨的中央及各級組織，沒收其財產，蘇共與俄共同時

註② 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p://65.110.85.181/uploads/pdf/essay2006.pdf>.

註③ 臺灣連續兩年自由評比皆有所進步，俄羅斯則連續兩年被評為不自由的國家。請參閱：  
<http://65.110.85.181/template.cfm?page=211&year=2005> 及 <http://65.110.85.181/uploads/pdf/Charts2006.pdf>.

註④ 請參見 Andreas 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 2 (1998), pp. 91~107.

註⑤ 請參見 Doh Chull Shin, "O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A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47 (1994), pp. 138~139; Scott Mainwaring,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Issues,"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2), p. 295.

註⑥ 請參見 Schedler, *op. cit.*, p. 92.

註⑦ 請參見李西潭、張孝評，「台灣民主化分析－Rustow 與 Huntington 模式的檢驗」，*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0 卷第 2 期 (民國 91 年)，頁 46~47。



瓦解。<sup>⑧</sup>蘇聯的解體開啓了俄羅斯民主化的進程，隨後葉里欽採取的一連串民主化作為，使俄羅斯的自由民主開始逐漸大幅度成長與進步。但隨著 2000 年新任總統普欽（Vladimir V. Putin）的上台，在他採取一連串政治迫害行為，以及鞏固行政權的措施後，俄羅斯在「自由之家」的評比有嚴重退步的現象。<sup>⑨</sup>

俄羅斯此一發展和台灣呈現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兩國之間在民主發展上的異同乃是值得探討的議題。<sup>⑩</sup>全文架構如下：除前言部分說明本文主旨與所欲討論之問題外；第一部分將對民主鞏固之概念作概括性的整理與解釋；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將分別說明台灣與俄羅斯民主發展過程及其自由、人權現況；第四部分將以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的模式，進一步比較台灣與俄羅斯民主化進程之差異；第五部分則為結論。

註⑧ 請參見畢英賢，**俄羅斯**（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 84 年），頁 1。

註⑨ 「自由之家」《2005 年全球自由》報告的主要發現指出，2004 年全球自由最顯著的發展為前蘇聯國家在政治上的變化，其中以俄羅斯在民主自由方面的持續衰退為代表。請參見 Arch Puddington and Aili Piano, "The 2004 Freedom House Survey: Worrying Signs, Modest Shift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No. 1 (2005), p.103. 而 2004 年台灣總統選舉雖紛紛擾擾，但「自由之家」對於台灣公民自由指標的評比卻不降反升（從 2 變成 1）。請參見 Puddington and Piano, *op. cit.*, p. 107.

註⑩ 至於為何選擇台灣與俄羅斯兩個國家來做比較的理由，分述如下：

1. 同樣被歸類於「第三波」民主化的台灣與俄羅斯兩國，雖然都是在一黨體制下以變革方式來啓動民主化，但原來的俄羅斯屬於共產主義極權專制的典型國家；而台灣雖長期實施戒嚴與動員戡亂體制，國民黨一黨獨大之下仍然實施有限的地方自治，因而被歸類為準列寧主義的威權政體。因此，兩國自從 1996 年至今雖皆舉行過 3 次的總統選舉，但民主政治發展卻有截然不同的結果。依據歷年來 Freedom House 的年度調查報告，1995 年兩國的自由程度曾經十分接近。當時台灣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項指標上的等級均為 3；而俄羅斯的「政治權利」等級為 3，「公民自由」等級則為 4。然而，從 1996 年至今為止，吾人發現前者持續往民主鞏固的方向發展，後者則面臨到民主倒退的問題。其中造成兩個國家民主發展不同的原因，乃是一項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筆者期待透過這樣的研究，作為比較新興民主國家政治表現的一個初步探試。

2. 筆者 2004 年曾有機會前往俄羅斯進行學術交流，深刻體會到後共產主義社會的俄羅斯雖然在政治轉型後十年左右，仍然留下許多共產主義政權的遺緒（legacy），包括水電免費、搭地鐵不論遠近皆收低廉的費用（不過沒有廁所）等；但卻治安敗壞、索賄嚴重，白天連在莫斯科大學校園附近閒逛都會被警告不能單獨行動、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自行開車據說容易遇搶，更誇張的是申請經核准後欲進住莫斯科大學時其管理員仍要索賄。然而，其藝術、文學、音樂、建築等皆具超高水準，包括很多地鐵站像藝術宮殿一樣，卻又令人驚嘆不已。顯然，這個國家人民的文化生活重於經濟與政治生活。至於政治方面，參觀克里姆林宮時深刻感受到這裡曾長期受到共產主義極權專制的統治；尤其是參與莫斯科市一個區政單位的座談時，發現他們從來沒有過地方自治經驗，正在摸索民主的程序與運作方式。當時就萌起以台灣與俄羅斯做為比較研究對象的念頭，加上 2005 年 4 月筆者在政大俄羅斯研究所主辦的「台俄民主鞏固與深化：普欽與陳水扁總統第二任期面對的挑戰與契機」學術研討會中有機會受邀發表論文，便構思以「民主鞏固或崩潰」的主題來分析造成威權政體下的台灣與極權政體下的俄羅斯民主發展不同的因素。

3. 本文對學術發展的意義，主要在於以 Samuel P. Huntington 的「雙翻轉測驗」、Andreas Schedler 的民主鞏固理論、Georg Sorensen 的民主轉型模型以及 Freedom House 年度調查報告的評比，來檢驗與分析台灣與俄羅斯的民主發展及民主鞏固程度。這是過去學者並未採用過的比較方法，且上述觀點並非互斥而是具有互補的作用。



## 貳、民主鞏固的概念意涵

早在1995年8月台灣即將舉行首次總統直選前，國內外多位著名學者曾齊聚台北，舉行「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發展與鞏固」國際研討會，其中Guillermo O'Donnell發表的「關於鞏固的迷思」一文曾激起了民主鞏固概念廣泛的爭辯。後來，該論文在民主期刊刊出後<sup>①</sup>，研究南歐民主化的學者Gunther立即提出答辯<sup>②</sup>，而O'Donnell也再度為文回應相關的答辯內容。<sup>③</sup>然而，儘管Andreas Schedler於1998年發表「什麼是民主鞏固？」一文，明確提出區別消極與積極的民主鞏固概念後<sup>④</sup>，但相關論辯與爭議卻仍方興未艾。2001年出版的民主思想百科全書不但提出狹義與廣義民主鞏固概念的區分<sup>⑤</sup>，同時也針對民主鞏固的概念提出以下的說明：

民主鞏固概念已經變成比較政治中最常使用的概念之一，從1980年代開始這個詞被選擇來作拉丁美洲、東歐、東亞與南歐的政治研究。最近，這個概念也被學者們使用在西歐的研究上面。因此，民主鞏固概念的重要性在當代思考民主政治上已經不再具有爭辯。然而，這個概念受歡迎的背後卻有其代價，尤其是缺乏民主鞏固意涵的明確性與一致共識。<sup>⑥</sup>

不過，吾人認為Schedler在先前討論「民主鞏固的各種概念」時，所提出的民主鞏固消極與積極概念的區分，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首先，他提出四種層次的分類法——「威權主義」、「選舉的民主」、「自由的民主」與「先進的民主」（見圖一）。<sup>⑦</sup>接著指出：我們認定民主鞏固概念的意義，必須考慮到我們站在什麼地方（經驗性觀點），以及我們要達成什麼目標（規範性水平）這兩項因素。「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代表民主鞏固的經驗性指涉。「自由的民主」欲避免「選舉的民主」之出現，而「選舉的民主」欲達成「自由的民主」之發生。換言之，民主鞏固的過程其實就是國家在時間序列上，避免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進而邁向更穩定之民主制度的過程。由此可知，Schedler認為民主鞏固在本質上乃是一種目的論的概念（teleological concepts）。民主鞏固的消極概念是關心民主穩定，並避免倒退；而其積極概念則是關心民主進展並提昇品質。<sup>⑧</sup>

註① 請參見O'Donnell, *op. cit.*, pp. 34-51.

註② 請參見Richard Gunthe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and Hans-Jurgen Puhle, "O'Donnell's Illusions: A Rejoind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4 (1996), pp. 151-159.

註③ 請參見Guillermo O'Donnell, "Illusions and Conceptual Flaw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4 (1996), pp. 160-168.

註④ 請參見Schedler, *op. cit.*, pp. 91-107.

註⑤ 請參見Paul B. Clarke and Joe Foweraker, eds., *Encyclopedia of Democrat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75-178.

註⑥ *Ibid.*, p. 175.

註⑦ 請參考Schedler, *op. cit.*, pp. 93-105.

註⑧ 除了民主鞏固概念外，其他相關概念請參閱圖三至圖五的說明。請參見Schedler, *op. cit.*, p. 95.



圖一 民主鞏固的概念



除此之外，Samuel P. Huntington 在**第三波**一書中提出一個衡量鞏固程度的標準，那就是「雙翻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運用這種測驗，如果在轉型期的初次選舉中掌權的政黨或團體，在此後的選舉中失利，並把權力移交給選戰中的獲勝者；然後，如果這些獲勝者又和平地把權力移交給次一屆選舉中的獲勝者，那麼，這樣的民主政權就可被認為是已經鞏固。因為透過選舉選擇統治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唯有統治者願意依據選舉的結果而放棄權力，民主才是貨真價實的。<sup>⑩</sup>這種將民主鞏固的概念侷限於選舉的觀察，被視為只是民主鞏固的狹義概念，曾遭受到一些批評。<sup>⑪</sup>事實上，Dankwart A. Rustow 於 1970 年提出的民主化模式中，早就將民主鞏固階段界定為：民主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之中。<sup>⑫</sup>而 Georg Sorensen 則進一步指出：鞏固不是純粹的政治過程，而是也需要社會與經濟的變遷，且鞏固的最後階段乃是民主的制度與實際變成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過程。<sup>⑬</sup>

這種廣義的民主鞏固概念提供了一種更為豐富，可以區分鞏固內容細部差異的觀察角度，並且提供了欲克服狹義概念侷限性的學者一個研究的起始點。也就是這種民主的多面向觀察提供了狹義概念所無法達到的成果。畢竟 Huntington 提出「雙翻轉測驗」來作為檢驗民主是否鞏固的標準雖然明確清晰，但難免流於狹隘與形式化；唯有民主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之中，民主鞏固才真正實質完成。<sup>⑭</sup>

然而，究竟民主鞏固的意涵為何，至今各界仍然沒有共識。為了回應這個問題，學者們紛紛提出了概念的重新評估。有些學者認為一個廣為使用的概念在定義上不明確是無法避免的，但是他們仍針對概念的分析、概念的結構與概念的各種不同用法作

註<sup>⑩</sup> 請參考 Huntington, *op. cit.*, pp. 266~267.

註<sup>⑪</sup> 主要的批評有兩點：1.強調選舉的重要性只是對於民主政體的部分瞭解。因此，這樣的觀念乃是比較政治分析不良的比較工具。隨著越來越多國家達到所謂狹義民主鞏固，這些南歐、拉丁美洲、東亞、東歐的國家均被視為朝向北大西洋的舊民主政治演進，這樣的觀念恰巧與那些強調民主品質與民主類型的質化 (qualitative) 學者看法朝著相反方向而行。2.將焦點狹隘地放在持續性有效選舉的過程，反而忽略了民主轉型後經常發生的其他體制方面重要制度的轉變。請參考 Clarke and Fowerake eds., *op. cit.*, p. 176.

註<sup>⑫</sup> 請參見 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 3 (1970), pp. 337~363.

註<sup>⑬</sup> 請參見 Georg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2nd e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p. 46.

註<sup>⑭</sup> 若依「雙翻轉測驗」定義，那麼台灣短期內似乎就可以完成民主鞏固。但若依廣義的民主鞏固定義，顯然台灣可能還需要數十年的時間，因為「西方先進國家 75%到 92%支持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民主鞏固的門檻至少也要有 70%的支持；但台灣人民支持民主的水平仍然偏低，在 1998 年時只有 54%而已。」請參考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 Doh C. Shin, "Halting Progress in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1 (2001), pp. 124~125；李西潭，「民主鞏固概念的爭議」，台灣政治學會 2002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政治學會，民國 91 年 12 月 14-15 日），頁 20-21。

了一番澄清與鑽研的工作。<sup>④</sup>事實上，吾人認為：無論是 O'Donnell 與 Gunther 等人的爭辯、Schedler 提出的民主鞏固類型，或者是 Rustow 與 Sorensen 對民主鞏固過程的看法，其實都涉及到民主政治的定義與類型問題，甚至也論及民主政治的測量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分析。<sup>⑤</sup>

而由於民主鞏固既是一種目標，也是一種過程。因此本文基本上以 Schedler 的模型為主，從階段性的演變來分析台灣與俄羅斯的民主鞏固與崩潰。至於 Huntington 的「雙翻轉測驗」及「自由之家」的評比，則用來作為台灣與俄羅斯對照 Schedler 提出之各階段時表現判準的依據。所以除了簡單介紹民主鞏固的概念外，本文將以民主鞏固的類型、過程，以及民主政治的測量等面向，來比較台灣與俄羅斯在民主發展上的差異。<sup>⑥</sup>

### 參、台灣民主轉型與鞏固

台灣民主的轉型恰巧與全球性獨裁集權主義危機和民主化浪潮興起的時間相呼應；台灣民主轉型的進展並未造成原來威權體制的遽然崩潰，其快速的民主發展亦未導致大幅度的經濟成長衰退、社會的動亂和嚴重的政治傾軋，亦即台灣政權內部發生了一場由威權體制走向自由民主國家轉型的「寧靜革命」。<sup>⑦</sup>然而，究竟台灣在民主化

註④ 請參見 David Collier and Steven Levitsky,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49 (1997), pp. 430-451.

註⑤ 更進一步的詳細分析請參見李西潭，前引文。再者，由於對「民主鞏固」最致命的批評並非針對概念化的問題，而是針對運作化的問題，因此為了建立觀察的基準，Andreas Schedler 在 2001 年提出三種測量民主鞏固的指標，分別為：1.行為的基礎 (behavioral foundations)；2.態度的基礎 (attitudinal foundations)；3.結構的基礎 (structural foundations)。其中，政治行動者的行為往往比態度及結構的因素更加重要。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是否能夠順利鞏固，主要取決於政治行動者的行為民主與否。此外，Schedler 認為假如我們要測量民主鞏固，就必須將民主的穩定加以理論化。因此，吾人必須：1.界定民主的定義；2.使我們的定義運作化；3.檢證事實情況。請參考 Andreas Schedler, "Measur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6, No. 1 (2001), pp. 66-69, 84-85. Schedler 提出上述的觀點相當深入，本文除了在第五部分比較台灣與俄羅斯民主發展時，會適當地加以參考之外，如何運用 Schedler 提出的三種測量民主鞏固的指標，值得未來作進一步相關研究的參考。

註⑥ 本文在處理民主政治的測量問題時，主要是採取「自由之家」的指標，而這也是國際知名學者用來界定民主的標準。例如：Georg Soerson 在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一書中，便是以「自由之家」做為民主的測量指標，並提出兩項警告如下：1.他們對一個國家的可能表現與狀態，只提供粗略的近似值。2.針對新興民主國家民主程度的估計，只是體制移動中的快照。因為這些國家尚處於早期階段，而其從威權統治朝向民主統治的轉型可能會是一段漫長的過程。請參見 Sorensen, *op. cit.*, pp.16.另外，Robert A. Dahl 在 *On Democracy* 一書中，也提到「自由之家」為一超黨派組織，其指標可用來界定一個國家的民主或專制程度。請參考 Robert A. Dahl, *On Democrac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97-198.

註⑦ 所謂「寧靜革命」具有雙重含義：1.台灣的民主進程沒有暴力和流血，是百分之百的和平演變；2.完全符合「寧靜」的詞義，幾乎無聲無息、沒有被外界注意就實現了民主轉型。請參考阮銘，*民主在台灣*（台北：遠流，民國 89 年），頁 30-33。



的過程中具有何種特質？相較於其他同樣處於民主轉型新興民主國家，朱雲漢曾研究指出具有下列非常獨特不同的特色：1.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並非再一次的民主化蛻變；2.台灣民主轉型始於一黨專制，並非由軍事政權過渡到民主體制；3.台灣民主轉型沒有遭到重大政經危機衝擊，並未伴隨社經改革的要求；4.台灣民主轉型乃潛在著族群分裂與衝突，並促使台灣政治本土化；5.台灣民主轉型不僅對合法性提出異議，並對國家正當性有所質疑。<sup>⑳</sup>另外，由執政黨改革派帶頭與反對黨溫和派進行協調磋商，並引領國家邁向民主化的變革模式；<sup>㉑</sup>政府與反對派皆展現成熟的民主表徵，致使社會並未發生重大的暴力，這般的理性妥協、低度暴力亦是台灣民主轉型的卓越表徵。<sup>㉒</sup>

在台灣民主化之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形式屬於威權主義政體，或者最多只是準列寧主義政體。<sup>㉓</sup>威權主義乃是一種理念或由上而下的政府運作方式，強調政府的權威應該凌駕於個人之上，而忽視了人民的同意。<sup>㉔</sup>當時的準列寧主義政體或威權統治模式

註 ⑳ 有關特色的說明與介紹，請參閱 Yun-han Chu, "Taiwan's Unique Challeng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1996), pp. 69~71.

註 ㉑ Huntington 分析民主化過程的三種類型：首先，當執政的菁英帶頭實現民主時就出現變革 (transformation)。另外，第二種是替換 (replacement)，當反對派團體帶頭實現民主，而且威權政體垮台或被推翻時，便出現替換，例如葡萄牙、菲律賓。第三種進程則是移轉 (transplacement)，當民主化主要是因為政府和反對派團體採取聯合行動而實現時，便出現所謂的「移轉」，例如韓國、南非。請參見 Huntington, *op. cit.*, pp. 114~163. 需要進一步的說明乃是：本文依據 Huntington 對於民主化過程類型將台灣歸類為威權政權一黨制在經濟發展成功後，掌權者扮演決定性角色並發揮帶頭作用的變革模式；但是並未因此否定民主化原因中的各種可能因素，包括：反對勢力的爭取、市民社會興起與壓力、甚至外在國際環境的影響、或是所謂示範效應或滾雪球等。請參考李西潭，「從民主化相關概念探討台灣民主轉型的歷程—兼論孫中山建國三程序的意義與作用」，*政治學報*，第 29 期 (民國 86 年)，頁 175。

註 ㉒ 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執政的國民黨改革派扮演重要且決定性的角色，其逐步由一威權而排他性的政黨，朝向民主、競爭的政黨體系邁進，同時亦由外造政黨轉變為內造政黨。爾後藉由黨內初選制度與菁英的分化，使得黨國體制發生內在的轉化—從「民主集中制」到「黨內民主」。為了達到政治改革的目標，國民黨常和民進黨領袖進行協商與合作，並逐漸減低國民黨內保守派的政治勢力，以利民主化的進行。再者，台灣雖在民主化過程初期，曾出現低度暴力事件，但並未發生嚴重的流血或傷亡。1979 年 12 月的高雄美麗島事件，遊行過程中雖出現暴力，但是僅一百八十三名警察受傷。1986 年 12 月，台灣反對派主要領袖譴責群眾在機場用石塊攻擊警車，並宣佈「安全第一、自由第二」。請參考江炳倫、吳文程，「國民黨政治角色的轉變」，*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制度與影響*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 81 年)，頁 121；倪炎元，*東亞威權政權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 (台北：月旦，民國 84 年)，頁 165~166；蔡玲、馬若孟、羅珞珈譯，*中國第一個民主體系* (台北：三民，民國 87 年)，頁 68~70；阮銘，*民主台灣 vs. 共產中國* (台北：玉山，民國 90 年)，頁 208；Huntington, *op. cit.*, p. 195. 另外，2000 年 3 月總統大選後，發生群眾包圍國民黨黨部的暴力事件，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呼籲黨員用充盈的瞭解與愛心來看待抗議民眾，不可有任何對立的行動，建立了政黨輪替的風度與模範。請參閱 *中國時報*，民國 89 年 3 月 22 日，版 5。

註 ㉓ 吳玉山指出：在民主化之前，台灣的政黨體系屬於 Sartori 所稱的霸權一黨制 (hegemonic one-party system)，即是由國民黨一黨壟斷的體制。當時的中國青年黨與民主社會黨缺乏政治實力，且與國民黨關係密切，故並非多黨競爭意義下的反對黨。吳玉山，「半總統制下的內閣組成與政治穩定—比較俄羅斯、波蘭與中華民國」，*俄羅斯學報*，第 2 期 (民國 91 年)，頁 241。

註 ㉔ 請參見 Andrew Heywoo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1997), p. 36.





奠定未來民主鞏固基礎的重要原因乃是：國民黨政府並未以激進手段完全消除市民社會，實施的大部分是市場經濟制度，且地方層級的選舉從未間斷過。<sup>③</sup>由於在威權統治時期，政府並未完全去除公共領域與個人領域的分界，因此，在自由化後，市民社會中原本存在的各種民間團體，例如企業組織、利益團體、俱樂部、家庭等，都進一步呈現出多元發展的傾向。

依據「自由之家」所發表的年度報告，台灣的民主化開始於1987年，國民黨政府將施行38年之久的戒嚴法廢除，且在1988年國民黨的李登輝成為第一位本省籍的台灣總統。他的執政改變了來自中國大陸的逃亡者及其後代，以14%的台灣人口在政治上居於掌控地位的事實。自從1996年開放總統直選後，台灣的自由程度不斷提升，2000年更完成了首次的政黨輪替。但2004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卻對民主發展造成嚴峻的挑戰。<sup>④</sup>以下分爲兩個部分進一步來加以說明：一爲台灣的整體發展；二爲台灣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

### 一、整體發展

1996年3月，李登輝先生當選中華民國首屆民選總統，完成了台灣由威權體制轉型至民主體制，台灣人民能夠以民主方式變更他們的政府，「自由之家」特別在1996年公布的世界各國自由報告中提出評論：台灣成功地完成民主轉型，亦即透過自由與公平的選舉，在多黨體系競爭之下完成總統直選，呈現政治多元主義；因此正式將台灣列爲既是「選舉民主」，也是「自由民主」的國家。<sup>⑤</sup>在本次選舉過程中，中國大陸顯然不願見到二千三百萬人民選出自己的總統。爲了影響選舉的進行與結果，透過發射導彈的方式，引起台海危機，但並未動搖台灣政府當局與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決心。1997年11月的地方選舉，民進黨淡化其獨立立場，並承諾回應做一個乾淨與全民政府，結果首次在行政席次和得票率（43%對42%）上擊敗國民黨。1998年12月，國民黨於地方和中央選舉中稍微扳回局面；民進黨成立十年後首度遭遇較大的挫敗，但

註③ 學者鄭敦仁曾以「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Regime）來形容國民黨政權的性質，而台灣國民黨這種「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不同於中國共產黨的「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全面控制」性質。因爲國民黨由黨長期壟斷政治權力，其意識型態堅持訓政時期之後即過渡到民主階段，並以實現民主爲目標，統治作用有一定的範圍與限制；反之，共產黨除了由政黨意識型態完全決定國家的性質與目的外，並堅定地將反對共產主義的民主派，視同爲對國家之不忠和背叛者，其統治作用涉入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並完全服膺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 41 (1989), pp. 471~499; 李酉潭、張孝評，「民主化與台海和平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4期（民國93年7、8月），頁23。

註④ 請參閱「自由之家」2004年世界各國自由年度調查報告，其中有關於台灣的部分。<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4/countryratings/taiwan.htm>

註⑤ 請參見 Adrian Karatnycky,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 s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7), p. 6, 8, 18.



仍維持重要地方政府與幾乎整個南台灣的控制權。<sup>㉞</sup>國民黨嚴重性的分裂在 1999 年中期又浮上檯面，前台灣省省長宋楚瑜脫離國民黨，逕自宣佈參選總統。國民黨黨中央之權力與黨員之向心力也逐漸變弱。由於國民黨內部擔憂其他重要黨員會跟進離開，於是在同年 11 至 12 月期間，由國民黨考紀委員會開除黨內二十七名擁護宋楚瑜支持者的黨籍。<sup>㉟</sup>

2000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人民在期待政治改革中，用選票終結國民黨五十幾年來的長期執政，而以強調新中間路線作為選舉主軸的陳水扁，在 39.3% 的票數支持下，成功當選總統。陳水扁的獲勝，不但首創台灣的政黨輪替，完成台灣第一次政權的和平移轉，也為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寫下歷史新頁。<sup>㊱</sup>因此，有學者提出評論：過去幾年來，我們看到那些經歷數十年一黨威權體制的國家（例如南韓、台灣、墨西哥）發生極大的變化。這些國家的反對黨所提名之候選人在總統大選中得到令人吃驚的選舉勝利，不僅代表民意終於得以被自由、民主地表現出來，同時也意味著一黨專政冗長潰敗過程的終結。<sup>㊲</sup>更重要的是，若從 Huntington 提出的民主鞏固判別標準：「雙翻轉測驗」來衡量，台灣大致上已經初步通過了第一次的檢驗。<sup>㊳</sup>

除了在總統大選中獲勝成為執政黨，民進黨在 2001 年 12 月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也大有斬獲：民進黨贏得立院 225 席中的 87 席次，與 1998 年的 70 席相較，席次增加成為國會最大黨；相較之下，國民黨只獲得 68 席，比前次的 123 席下降許多。此外，由被國民黨開除的宋楚瑜領導之親民黨獲得 46 席位，而支持前總統李登輝的台聯黨則贏得 13 席位。

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在 2004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中，面臨嚴峻的挑戰。尋求連任的陳水扁總統，在此次選舉中獲得過半數（50.1%）的選票。然而，以國民黨為首的在野黨陣營，卻認為選舉結果不符合公平原則，並進行一連串的抗議活動。<sup>㊴</sup>理由在於投票的幾個小時前，陳總統與呂副總統遭受槍擊。原本被認為可望輕鬆贏得選舉的反對黨國民黨候選人，宣稱槍擊案是自導自演用以獲得同情票。被國民黨控制的立法院，在 8 月份通過一項法案成立委員會去調查槍擊案。民進黨與它的盟友台聯，抵制該委員會的成立，理由在於違憲。例如：在當時的條文中，委員會擁有無須經過授權限制人民自由的權力。<sup>㊵</sup>儘管如此，根據「自由之家」強調選舉公平性之評比，台灣在

註 ㉞ 請參考 Karatnycky, *op. cit.* (2000), p. 469.

註 ㉟ *Ibid.*, p. 468.

註 ㊱ 請參考 Karatnycky, *op. cit.* (2001), p. 521.

註 ㊲ 請參見 Dorothy J. Solinger, "Ending One-Party Dominance: Korea, Taiwan, Mexico,"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1 (2001), p. 41.

註 ㊳ 2000 年總統大選，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先生僅以不到 40% 的得票率獲勝。2004 年則以些微差距領先對手（0.228%），勉強贏得過半數選票而勝選。然而，因為台灣體制不清，民進黨加上台聯黨（所謂泛綠）始終尚未取得國會過半數席次，因此政黨是否已經完全輪替，仍存有爭議。

註 ㊴ 請參見 Yun-han Chu, "Taiwan's Year of Stres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No. 2 (2005), p. 43.

註 ㊵ 同註 34。



該年仍屬於自由國家。<sup>④</sup>換言之，在此一具公信力的國際組織眼中，台灣的總統選舉是相當公平且得到肯定的。此外，台灣亦於同年年底舉辦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的結果顯示，由國民黨、新黨、親民黨所組成的泛藍陣營，剛好得到超過國會席次半數的席位（114席），而泛綠陣營（包括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團結聯盟）則獲得101席。儘管從整體選舉結果來看，泛藍陣營減少一席而泛綠陣營增加一席，藍綠雙方各自的席次與前一屆（第五屆）立委席次變動不大，各自維持了原本的政治版圖。然而，泛綠陣營因為無法獲得國會多數，也使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未來在國會內勢必遭遇更嚴厲的挑戰，而總統的行政權力也將受到強力的監督與制衡。

有學者曾表示，在近幾年差不多一百個被認為正在政權轉型的國家中，僅有少數比例且不超過二十個國家能夠清楚明白地走向成功的民主道路——擁有完善的民主運作程序，或者至少具備某些民主制度的開展，而且充滿信心地享有民主化的動能<sup>⑤</sup>；其中最值得注目且唯一的東亞國家就是——台灣，相較於菲律賓與南韓的民主進度，似乎向前推移了一大步。雖然這些轉型國家的政治處境並不是堅如磐石，但卻能因為經過足夠時間的歷練，而成為民主轉型的典範。<sup>⑥</sup>然而，為了保證台灣民主化成果能夠順利地運作長存，可能還必需通過「雙翻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的試鍊並使民主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中；另一方面在自由程度被評比為與美、英等先進民主國家同列為最高等級的時候，如何提升民主政治的品質，乃是台灣邁向先進民主國家必須面對的挑戰。<sup>⑦</sup>

由於1997年後的憲法增修條文賦予總統單獨任命行政院長的權力，<sup>⑧</sup>即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須經過立法院的同意。這樣一來，雖然總統權力擴增，但這並未違反自由民主的精神。因為台灣在政治、社會上普遍呈現出多元政體的特質，且市民社會並未受到政府不當的政治干預或打壓，因此，才會被「自由之家」評比為最高等級自由的國家。雖然台灣既有的憲政制度與慣例賦予總統極大的權力，但自從1996年總統民

註④ 請參閱「自由之家」2004年世界各國自由年度調查報告，其中有關於台灣的部分。<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4/countryratings/taiwan.htm>。此外，於「自由之家」公布的2005年世界各國自由年度調查報告中，台灣因為進行司法改革，降低了貪污腐敗與政治當局的干預影響。詳見：<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5/Spain-Zimbabwe.pdf>, pp. 617~620。

註⑤ 請參考Larry Diamond, "Is The Third Wave Ov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1996), pp. 20~37.

註⑥ 參見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1 (2002), p. 9.

註⑦ 參閱李西潭，「邁向先進的民主：二十一世紀台灣民主化的展望」，「跨世紀的政治願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民國88年），頁43~65。Schedler所謂的深化民主（deepening democracy）乃是指：民主政治的品質如何從「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提升到「先進的民主」之水準。參見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p. 91~107.

註⑧ 台灣自從1997年修憲後，總統便有不經國會（立法院）同意就直接任命行政院長的權力。這個權力搭配被動的解散國會緊急命令權及若干的行政領導權，使中華民國的半總統制屬於總統權力較大的「總統—國會制」。請參見吳玉山，「半總統制下的內閣組成與政治穩定——比較俄羅斯、波蘭與中華民國」，頁239。



選以來，歷任總統權力受到的制衡卻是越來越大。政黨輪替後，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從未在立法院取得過半數的席次，總統權力所受到的監督與限制也就越來越多。<sup>④</sup>

## 二、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

台灣目前的憲政制度是沿用 1946 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設計的一種混合式的總統及議會制。從 1996 年開始，總統是透過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並享有行政權。他可以任命行政院長，也可以解散國會。而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立法委員則是經由民選產生，任期三年。<sup>④</sup>依據「自由之家」歷年的世界各國自由年度調查報告，台灣在評比上首度被列入自由國家，是在 1996 年開放總統直選後，當時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等級均由 3 提升為 2。之後台灣的自由程度是不斷進步的，而依據 2005 年最新出爐的調查報告，更難能可貴地在兩項指標上均獲得最高等級的 1，使台灣成為亞洲唯一最自由的國家，並與美國、英國等其他四十九個國家並列為全球民主及自由度最高的國家（台灣自由程度之變化，詳見表一）。

台灣成為自由國家最佳的表徵是：人民享有大部分的基本人權可以藉由選舉來改變他們的政府。自從 1996 年進一步民主化以來，台灣在政治上已轉型為具有多元主義色彩的東亞政體。Huntington 曾指出，第三波民主化的障礙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面相。其中，從文化上來看，一個在心靈深處反民主的文化，會阻礙民主規範在這個社會的傳播，而且否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由於傳統的儒家強調團體、團隊高於個人、權威高過自由、責任高於權利，因此，他認為強調以和諧，合作優先於分歧、競爭的文化，在根本上是不利於民主化的。<sup>⑤</sup>雖然儒家社會強調紀律與服從的傳統，使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出現了盲從式的威權主義。<sup>⑥</sup>不過，值得肯定的是，台灣在民主化後，

註④ 或許有人認為自 2000 年以來，經常可見陳水扁總統或執政當局無視憲法之存在，且有諸多違反立憲主義精神與原則的行為，不願受制於憲法對其權力之規範。分析其原因，主要可能是我國現行的「雙首長制」無法順暢換軌所致。自從 2000 年陳水扁就任總統以來，的確面臨到「新總統 v.s. 舊國會」或「新國會 v.s. 舊總統」的政治局勢。而造成台灣「雙首長制」無法順暢換軌的制度性因素則包括：1. 立法院中沒有穩固團結的多數黨及 SNTV 立委選制；2. 行政指揮系統的二元化；3. 總統在實際憲政運作上對閣揆有主動免職權；4. 總統沒有主動解散立法院的權力；5. 相對多數制的總統選舉制度及總統與立委選舉制度的不一致。參閱蘇子喬，「我國「雙首長制」為什麼不會換軌？——制度因素之分析」，**政治學報**，第 40 期（民國 95 年），頁 63~74。然而，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之下，政治領導的藝術與人格風範就更加顯得重要。以 2000 年政黨輪替初期廢核四案來說，當時陳水扁總統選在與在野黨主席連戰先生見面的當天下午就逕行由行政院宣布，造成輿情一片譁然。雖然陳水扁總統在大法官會議解釋後，不得不恢復興建核四，但如此一來反而給反對黨找到不斷攻擊的藉口與不信任的理由。若當時扁政府能夠審慎處理，將核四案存廢問題的燙手山芋重新丟回給立法院來進一步討論，而不是由行政院透過行政命令逕行決定，相信這樣的領導藝術反而能夠發揮折衷妥協的精神，讓政務推展更加順暢。

註⑤ 依據 2005 年 6 月 10 日任務型國民大會複決的第七次憲法增修條文，立法院的組成將有所調整，包括立法委員席次減半，以及任期由三年延長為四年。上述改變將自 2007 年起生效。請參閱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http://law.moj.gov.tw/>。

註⑥ 請參考 Huntington, *op. cit.*, pp. 294~315.

註⑦ 請參考 Heywood, *op. cit.*, pp. 34~35.



政治上不但逐漸去除了儒家文化反民主的影響，更呈現出多元主義下的差異性與多樣性。台灣社會多元主義的色彩，反映在政黨競爭、價值的多樣性等方面。以下分為政府、司法、新聞自由、宗教信仰與學術自由、集會與結社自由、原住民與婦女權益等議題來說明台灣目前的現況及其所面臨的問題。

### (一) 政府

現任總統陳水扁的政策理念是以終結國民黨時代的黑金政治與杜絕賄賂為主要目標。例如針對立法委員和地方自治選舉，法務部起訴了超過一百件的買票事件，並有許多行政官員與地方首長因貪污而被起訴。儘管如此，2002年兩件被揭發的醜聞更是引起軒然大波。一位開發公司的大股東就承認他曾經資助過民進黨和國民黨人士。同時，高雄警方也查出朱安雄議長賄選弊案。德國國際觀察團指出在2004年的年度貪污調查指標中，台灣在146個國家中，排名第35。<sup>⑫</sup>另外，沒有任何報告指控台灣政府或其代言人是獨裁專制或濫殺無辜的，而且沒有人因為政治迫害而失蹤。一般而言，政府當局普遍重視公民的人權，但政府官員貪污的問題仍然值得重視。<sup>⑬</sup>

### (二) 司法

臺灣的司法大致上獨立，裁判一般來說也是公正的。首先，依據2004年觀察的結果，司法改革已經降低了貪污及對法院的政治影響力，不若以往是個「嚴重的問題」。其次，在8月，法務部成立一個任務小組去調查司法界的貪污，並有幾名官員接受調查。接著，9月，政府重申它打擊組織犯罪、貪污及賄賂的決心，特別是在預定12月舉行的立法委員選舉之前。另外，依據臺灣的司法制度，目前沒有陪審團的設立，是由法官審理所有的案件。其他司法中立的運作表現在下列觀察：1. 依據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歷史與文化上貪污的傳統妨礙了警察的效率；然而，警察在文官的控制下，並沒有迫害人權的問題。2. 任意的逮捕和拘禁是不被允許的，而維持治安單位通常會遵守這項禁令；警察偶爾會濫用限制身體行動的權力。3. 允許律師在具體地訊問中提出質疑以防止拘禁的濫用。4. 監獄的設施被公認為能滿足需要且符合國際的標準，但過度擁擠是最大的問題。<sup>⑭</sup>另外，目前警方於偵訊時已能確實告知嫌犯所犯罪名、選任辯護人、請求調查相關證據、得保持緘默等權利。而且在執行拘提、逮捕、搜索或扣押

註⑫ 同註34。

註⑬ 請參考2005年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資料，網址為：<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5/61606.htm>。另外，自2006年以來，台灣在政治上發生了不少重大弊案，包括總統女婿趙建銘涉嫌內線交易遭起訴求刑八年、總統府前副秘書長陳哲男涉嫌內線交易案遭起訴求刑十二年、基隆市長許財利涉嫌購地弊案遭判刑七年、南投縣長李朝卿夫人簡素端涉嫌賄賂案遭起訴求刑一年等。參考自由電子報網站：<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jul/11/today-fo1.htm>；大紀元電子報網站：<http://www.epochtimes.com/b5/6/7/8/n1377941.htm>；<http://www.epochtimes.com/b5/6/9/21/n1462126.htm> &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11/n1185260.htm>。至於如何解決貪腐的問題，可能仍需從健全制度與法律著手，包括制訂陽光法案，參考香港經驗成立廉政公署，甚至於考慮實施公費選舉等。

註⑭ 同註34。



時，能確實出示令狀。但是法官經驗不足、質與量無法配合社會需求以及法院積案問題嚴重，值得司法當局重視。<sup>⑤</sup>

### （三）新聞自由

台灣媒體記者對於貪污系列的議題都有大量的報導而且都有鮮明的立場。依據美國國務院在 2004 年 2 月發佈的人權報告，台灣的平面媒體是完全獨立的，但電子媒體與廣播電視台仍然容易受到政府的影響。例如台灣的新聞自由也會受到政治力的影響，因而報導內容往往與實際運作不符。台灣的四大電視公司就分別受到民進黨、國民黨、軍方及政府本身財務上的資助，第五個才是公共電視。由於法律對於政府或政黨擁有或是經營媒體組織進行限制，以及絕大多數台灣人能夠接近 100 個有線電視台，故國家對於媒體的影響整體來說是極輕微的。<sup>⑥</sup>另外，法律保障言論與新聞自由，在網際網路的使用上不受任何限制，社會上充斥著各種不同觀點的出版品，且執政當局普遍尊重上述權利。不過，媒體偶爾會藐視個人的隱私權，並且經常錄影及播放警方的偵訊過程。<sup>⑦</sup>而「無疆界記者組織」則認為台灣記者享有的自由等級在亞洲是十分罕見的，對於貪污事件的調查不遺餘力且有時候在政治層面上相當具有批判性。<sup>⑧</sup>

### （四）宗教信仰與學術自由

所有的台灣人民都能自由地擁有自己的信仰，其中佛教和道教的追隨者佔了大約 40% 的人口。另外，學者與其他教育工作者都能自由地寫作及演講，顯示學術自由受到高度保障。<sup>⑨</sup>再者，法律保障宗教自由，而且執政當局實際上付諸實現。宗教組織可以依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但登記不是強制的。經過登記的宗教團體享有賦稅的減免，並且需要每年製作他們財務運作的報告。<sup>⑩</sup>

### （五）集會與結社自由

台灣人權、社會福利與非政府的環保團體在沒有阻擾的情形下可以活躍的運作，而且工會是獨立的，大約有 30% 的勞工參與工會的組成。不過，老師、公務員和國防工業工人被禁止集體地參加組織或討價還價。另外，法律在某些情形會限制罷工的權利，例如：允許主管當局介入勞資糾紛的調解，並在調解期間禁止罷工。再者，禁止台灣人民主張共產主義或台灣從中國獨立的法律依然存在，但是已經不再被強制執

註⑤ 請參考 2005 年中國人權協會 2005 年台灣人權指標調查報告書資料，網址為：<http://www.cahr.org.tw/>。

註⑥ 同註 34。

註⑦ 請參考 2005 年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資料，網址為：<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5/61606.htm>

註⑧ 請參考 2004 年無疆界記者組織的週年報告，其中有關台灣的部分，網址為：[http://www.rsf.org/article.php?id\\_article=10224](http://www.rsf.org/article.php?id_article=10224)

註⑨ 同註 34。

註⑩ 同註 58。



行。<sup>①</sup>另外，如果政黨的目的或行為被認為危害到中華民國的存在時，由大法官組成的憲法法庭擁有解散政黨的權力。<sup>②</sup>

### （六）原住民權益

依照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台灣 40 萬的原住民在主流社會中受到歧視。不過，不利於原住民的社會歧視在這幾年已經稍微減輕。大體而言，他們很少有機會能參與影響自身土地、文化與傳統的主要決策。華人開發、通商的結果，常透過「關係與腐敗」變成原住民土地的所有者，而且原住民表示，他們也被禁止在政府控制之下擁有特定的祖先土地。另外，依據台灣的憲法，所有公民均被賦予平等的權利，且為了使原住民後裔的權益受到保障，政府也制訂許多社會及教育計畫去幫助他們融入主流的華人社會。然而，即使有這些努力，原住民仍感受到不利的歧視。例如在 2004 年 11 月，大約 1000 位原住民舉行了一場示威去抗議行政院以經費不足為由，不補助遭受洪水破壞地區的重建。<sup>③</sup>

### （七）婦女權益

台灣女性近幾年來在職場的工作表現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根據報導指出：她們在私人部門仍然持續面臨到工作歧視。政府在 2001 年通過了在工作場所中禁止性別歧視的法律，以保護因年齡、婚姻或懷孕而有時被迫放棄工作的婦女，或比男性工作者升遷機會少且獲得薪資較低的婦女之權益。儘管政府以計畫保障婦女，強姦及家庭暴力仍然是嚴重的問題。雖然法律允許司法單位不待被害人提出告訴，便可調查家庭暴力的緣由以及起訴強姦犯，但文化規範抑制了許多婦女揭發這類型的犯罪。<sup>④</sup>另外，專家估計所有強姦犯罪的數量可能是有向警方報案者的十倍。法律提供了受害者保障，除非得到受害者同意，否則強姦犯罪的審判是可以不公開的。而且犯強姦罪者通常會被法院科處五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sup>⑤</sup>

## 肆、俄羅斯民主轉型

發生在 1989 年至 1991 年的東歐民主化歷程，造成了蘇聯解體，其主要特徵是採行多黨競爭的選舉及推行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俄羅斯必須解決的一項問題是：如何處理共產主義統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政治與文化後果。由於昔日嚴厲的新聞檢查與壓制反對勢力，造成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因而使公民文化所強調的參與、妥協及

註① 同註 34。

註② 同註 58。

註③ 同註 34。

註④ 同註 34。

註⑤ 同註 58。



共識均無從發展。因此，多黨政治的形成雖然乍見曙光，但是仍然無法將社會中的重要利益予以匯集。<sup>⑥</sup>而俄羅斯的民主轉型過程乃是從 1991 年蘇聯解體後開始，可說是全球性獨裁集權主義危機下的結果。從 1991 年政變到 1993 年 10 月事件前後這段時間，可說是俄羅斯政黨政治發展活動最頻繁的階段，由過去的一黨統治轉變為多黨競爭。<sup>⑦</sup>不過，葉里欽雖採取了一連串的民主化作為，使俄羅斯的自由與民主逐漸成長，但是 1993 年 10 月事件的發生，意謂著在其民主轉型過程中缺乏民主文化，致使行政與立法部門產生激烈的衝突。<sup>⑧</sup>儘管從 1996 年以來，俄羅斯恰巧與台灣一樣，至今也舉辦過三次總統大選，但吾人發現其政治發展卻面臨到嚴肅的民主崩潰問題。

在俄羅斯民主化之前，共產黨政府的統治形式屬於極權主義政體。極權主義的政治支配是無所不包的，建立在持久性的意識型態操控與壓制上。其目的在透過全面支配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方式，將各個面向予以政治化，以達到掌握全部權力的目的。因此，極權主義具有廢除私領域的傾向，與市民社會完全絕緣。<sup>⑨</sup>當時極權主義的統治模式造成最近民主崩潰的重要原因是：共產黨政府強調對所有經濟、社會生活的控制，使市民社會毫無發展的空間，且在經濟上採用由中央計畫的制度。故共產黨扮演著社會上領導與指導的角色，控制著所有的機構。

依據「自由之家」所發表的年度報告，大體而言，俄羅斯的自由民主從蘇聯解體、葉里欽執政開始有好轉的跡象，自由程度逐漸提升；但隨著葉里欽下台，他所選定的繼任者普欽上台後，俄羅斯的自由程度反而開始下降，其原因主要是普欽在其任內採取了一連串打壓新聞自由與反對派人士等作為所造成的。而這樣的發展趨勢，是否會進一步造成俄羅斯的民主持續倒退是吾人需要關注的重點之一。以下分為兩個部分進一步來加以說明：一為俄羅斯的整體發展；二為俄羅斯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sup>⑩</sup>

## 一、整體發展

1996 年的總統大選，葉里欽輕易擊敗對手共產黨員久噶諾夫（Gennady Zyuganov），似乎意味著俄羅斯人民有機會以民主方式改變他們的政府，因為東亞的台灣正是在開放總統民選後，進一步邁向民主鞏固。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俄羅斯隨後面臨到的一連串重大政經危機，使它的民主化進程，明顯有別於台灣和平演變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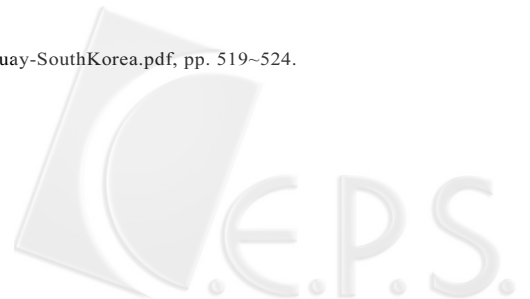
註⑥ 請參考 Heywood, *op. cit.*, pp. 32~33.

註⑦ 請參見 Joan DeBardleben, *Russia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7), pp. 180~181；郭武平，*俄羅斯的政黨政治*（台北：五南，民國 88 年），頁 39~40。

註⑧ 俄羅斯的憲政體制是以前蘇聯時期的憲法為基礎，加以改革而建立的。因此，一旦轉變為民主體制，由於缺乏民主政治文化中的妥協與調適的要素，必然會成為政治衝突的淵源。當國會與總統權力僵持不下時，葉里欽竟然於 1993 年 10 月下令以坦克砲轟國會大樓，並斷水斷電。十月事件的發生，除了表示葉里欽與國會議員的立場不同外，更反映出共產政治文化不能包容及意識型態僵化的特性。此種文化特性慣於將政治立場的不同簡化為善與惡的衝突。李國雄，*比較政府與政治*（台北：三民，民國 93 年），頁 371~372。

註⑨ 請參見 Heywood, *op. cit.*, p. 27, 33.

註⑩ 請參考網址：<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5/Paraguay-SouthKorea.pdf>, pp. 519~524.





式。首先，1998年盧布的貶值及經濟市場的崩潰，使俄羅斯的經濟遭受到重大衝擊，進而造就了一個回歸國家計劃經濟體系的新政府。接著，1994到1996年間為期兩年與車臣獨立派衝突的血腥戰爭於1999年再度爆發，更成為日後俄羅斯政府擴張權力的藉口之一。顯然，政治與經濟的難題已成為俄羅斯民主化的障礙。

為了解決政黨之間越來越嚴重的對抗以及從事經濟改革，俄羅斯政府採取所謂的「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不過，結果是失敗的。<sup>①</sup>葉里欽政府的內閣總理常常面臨被更換的命運，直到國家安全局局長普欽被任命為內閣總理為止。另外，葉里欽為了順利將他的政治權力轉移給他所屬意的接班人普欽，任期至2000年才結束的葉里欽在1999年12月31日出其不意的宣布辭職，同時提出聲明表示普欽為其屬意的下一屆總統接班人，並由當時擔任總理的普欽代理葉里欽總統職務，希望藉此接收葉里欽的所有政治資源。<sup>②</sup>而後2000年總統選舉，普欽在第一輪投票就順利以獲得百分之53選票之得票率擊敗久噶諾夫贏得勝利。

在贏得大選之後，普欽展現出與葉里欽對於權力完全不同的想法與作法。他拒絕採用葉里欽所謂「去權力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的統治方式，反而追求權力的再集中化。他希望建構一個以國家官僚為核心且有效率的政府，將權力集中在官僚體制手中，而整個官僚體系則由他來控制。<sup>③</sup>為了鞏固與集中個人的權力，普欽採取了下列一連串措施：1.推動立法將俄羅斯89個省長從上議院免職並且賦予總統將違反聯邦法律的省長停職的權力。2.創造了由克里姆林宮任命的人所領導的7個超級區域，並透過引入安全與軍方代表的方式，藉以改變俄國統治菁英的組成；<sup>④</sup>這些代表分別擔任部長、副部長、國會議員、省長與超級省長等職務，其佔全體政府職務的比例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五。3.透過一連串犯罪調查與反貪污運動的法律訴訟去削弱一些商業鉅子的政治影響力，但這些舉動很快的就被批評為是一種選擇性的政治迫害。<sup>⑤</sup>

在1999年8月二度爆發的車臣內戰中，武裝份子攻擊了鄰近地區並同時在數個城市從事公寓爆炸案，而克里姆林宮則譴責車臣好戰份子並採取打擊這些分離地區的行動。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車臣戰爭戲劇性地增加普欽的聲望。故在1999年下議院選舉中，親政府的勢力成為國會多數。另外，2002年10月，車臣好戰份子又在莫斯科戲院挾持了750名人質。在普欽的命令下，特種部隊實施攻堅，殺死了所有車臣好戰份子，同時也造成120名人質死亡。不過，這種強勢作為豎立了普欽在人民心中堅毅果決的形象，更有助於他的聲望與連任。

2003年普欽政府進一步鞏固其權力與影響力，在政府內有四分之一的重要行政與立法職位是由前軍方與安全局的官員擔任。早在普欽第一任任內，就開始透過一連串

註① 有關俄羅斯經濟改革的震盪療法以及對政治的影響，請參閱 DeBardeleben, *op. cit.*, pp. 214~246.

註② 請參見吳玉山，*俄羅斯轉型：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台北：五南，民國89年），頁106~110。

註③ 請參見 Lilia Shevtsova, "The Limits of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2004), p.69.

註④ 請參見 Michael McFaul and Nikolai Petrov, "What the Elections Tell U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2004), pp. 21~22.

註⑤ 請參考網址：<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2&year=2005&country=6818>



手段包括政治性的犯罪起訴全國性電視台老闆、關閉俄羅斯最後一家獨立電視台等方式，成功地掌握了全國性媒體，例如：ORT、RTR 與 NTV，<sup>⑥</sup>進而使國家的控制力進一步獲得鞏固。<sup>⑦</sup>而這也使媒體的獨立性受到政府嚴重侵犯，並使新聞自由等級下降。<sup>⑧</sup>另外，媒體關於政治的報導，也在普欽簽署一項國會通過的法律後受到嚴重的脅迫。該法律使媒體受到影響而去打壓批評政府立場的候選人。此一法案在俄羅斯引起極大的爭議，雖然後來被憲法法庭宣告無效，但該法律的實施已經造成媒體報導的寒蟬效應。俄羅斯聯邦議會主席米羅諾夫（Sergei Mironov）就表示，該法律形成的後果就是大眾傳播媒體被迫對於競選活動保持沈默。

隨著 2003 年年底國會選舉與隔年 3 月總統大選的即將逼近，俄羅斯出現了基本人權上值得注意的衰退以及獨斷的外交策略，反映出前安全與軍方官員權力的鞏固。在 2003 年 10 月，政府逮捕了能源公司尤柯斯（Yukos）的主席柯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他是俄羅斯最富有且最具影響力的企業家。一般認為柯多爾科夫斯基的被捕與對該公司其他人員的起訴，是出於政治因素而非不法賄賂。柯多爾科夫斯基曾經積極支持自由派的反對黨，而事實上對他的指控從早期俄國開始從共產主義轉向自由市場經濟時就開始了。當時俄國的法律混亂，使得許多從商的人並未完全遵守俄國法律，而從中獲取龐大的私人利益。普欽也因此得以藉口要整頓俄羅斯過去一直以來不正常的政商關係，進而建立起一套新的遊戲規則，<sup>⑨</sup>進一步控制國內的巨商富賈，使其不再支持反對派人士。同時，一家為反對黨工作的政治諮商公司總部也被警察搜索。整個 2003 年可以看到俄羅斯人民基本權利的持續惡化。另外，在同年 9 月，政府當局接管了國內最受尊重的民意調查公司 VTsIOM。其所屬人員表示政府是在該公司發表一連串「支持對車臣用兵的比率正在衰退，多數支持透過談判解決」的民調後，才展開此一動作，而這使俄羅斯的自由程度又更進一步下降。<sup>⑩</sup>

在 2004 年，普欽總統採取藉由對反對黨及市民社會進一步鞏固行政權的措施，強化了國家對於國營廣播媒體的控制，並且追捕政治上被起訴的商業領袖與知識份子。政府也宣布憲法的改變使統治者有指派或是選任官員的權力，而且普欽進一步計畫直接控制法官的任用與解雇。然而，普欽一連串不利於民主化的政治措施，似乎並未影響 1999 年第二次車臣戰爭以來個人居高不下的聲望。在 2004 年 3 月的總統選舉中，國營廣播電台及大部分的平面媒體都一面倒地擁護現任總統普欽，沒有一位挑戰者可以與他抗衡。普欽在第一回合投票便以超過 70% 的選票輕鬆打敗最接近的挑戰者，贏得勝利。

2004 年俄羅斯充斥著反叛亂的軍事行動、游擊戰、暗殺及車臣激進份子的恐怖行

註⑥ 參考 McFaul and Petrov, *op. cit.*, pp. 23~24.

註⑦ 俄國政府掌握媒體方式還包括：俄國一家獨立電視台因宣稱財政破產而被政府接收，但是俄羅斯政府卻拒絕新的投資者表達承接該電視台債務的請求。請參考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5/Paraguay-SouthKorea.pdf>, pp. 519~524.

註⑧ 請參見 McFaul and Petrov, *op. cit.*, p. 24.

註⑨ *Ibid.*, p. 26.

註⑩ 同註 70。



動。同時，在聯邦勢力扶持下的車臣政府，也從事「恐怖行動」，包括綁架，殺害被懷疑為車臣分離主義份子者等。從上述事件來看，平息叛亂與恐怖活動可能成為普欽擴張權力最好的理由。以終止在貝斯蘭（Beslan）鎮發生的悲劇為藉口，普欽公開推動一項先前經過政府高層長時間討論的計畫，進一步集中對俄羅斯各地區的控制，並且影響法官的任用與解雇。憲政的改革使總統可任命政府官員而不必透過選舉。面對普欽逐漸擴張的權力，大部分政府首長都公開同意自治權限受到限縮，儘管眾所周知的他們私底下對這個計畫並非心悅誠服。在國會中，支持普欽的團結俄羅斯黨掌握了超過憲政上三分之二的多數，並以決議方式通過打壓公眾輿論的措施。

2005年2月由總統任命而非普選產生地方政府首長，不論普欽的意圖為何，明確地表現出俄羅斯從一個「選舉式民主」的主要倒退。普欽的企圖是藉由限制民主選舉去強化中央對省級政治的控制，已經牢牢地掌握住數以百計的「小型寡頭執政者」（mini-oligarchs），這些「小型寡頭執政者」散佈在俄羅斯廣泛疆域及其89省中。<sup>⑧</sup>以上這些趨勢，再加上持續的媒體限制與自我審查、一個順從的國會（杜馬，Duma）、持續的貪腐與選擇性執行強制的法律、施加在司法上的政治壓力，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NGOs）受到的騷擾導致政府領導人對人民無法完全負責等，都是顯著的人權問題。<sup>⑨</sup>

## 二、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

俄羅斯1993年制定的憲法建立了一個強勢的總統制，規定總理由總統提名，經聯邦國會同意後任命，並向國會負責。假如國會連續三次否決總統所提的人選，總統便可解散國會，重新選舉並任命過渡總理。雖然國會可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但是在不信任案通過後三個月，必須再舉行一次投票，這時候總統亦可要求舉行國會改選。因此，如果國會決定拒絕總統所提的人選，必須先考慮可能的政治後果。<sup>⑩</sup>故在此種制度設計下，國會的制衡力量受到極大的限制。其次，這部憲法賦予總統三項權力，第一是總統專屬行政權；第二是控制內閣的權力；第三是當總統和國會對於政府人士或政策看法不一致時所給予總統制約杜馬的權力。<sup>⑪</sup>因此，在政治運作的過程中，總統能夠一一搬開阻礙他意志與政策實行的石頭與障礙，國會根本無法與之抗衡，進而使總統可以通過他想要通過的法律，實施他所想要實施的政策，也就是說幾乎沒有任何機制

註⑧ Kathryn Stoner-Weiss, "Russia: Authoritarianism without Author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 1 (2006), pp. 112-116.

註⑨ 請參考2005年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資料，網址為：<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5/61671.htm>

註⑩ 參考李國雄，前引書，頁374。

註⑪ 總統的權力極大，使他有權發佈命令及指示，並不需經過立法審查，而仍具備法律的效力。其次，他在特別的情形下，有權解散國會。第三，總統有權舉行公民投票（以前是由國會所掌握）。第四，他有權向國會提出法案，並公布聯邦法律。參考前註，頁373。另外，關於俄羅斯超級總統制詳細內容，請參閱吳玉山，*俄羅斯轉型：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趙竹成，「俄羅斯聯邦總統的權力與角色」，*理論與政策*，第16卷第2期（民國91年），頁47-64。



可以制衡總統。<sup>85</sup>對於接受共產主義之前，未曾存在民主傳統的俄羅斯而言，此種制度性的因素，可能會使民主發展在某種程度更加取決於政治領導人的態度。

在葉里欽執政的年代裏，共產黨不再獨享領導的地位，俄羅斯人民的政治自由與公民權利逐漸地成長，使政治不再是私人事務而是眾人之事，同時公民自由——包括演講、宗教、組織、出版與集會自由，開始廣泛的在俄羅斯傳播。<sup>86</sup>依據歷年來「自由之家」發表的年度報告，在 1995 年至 1997 年之間，可說是近年來表現較好的時期，當時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等級均為 3，並被列入「部分自由」的國家。然而，自從 1998 年後，吾人發現俄羅斯的自由程度呈現出持續倒退的現象。2005 年「自由之家」的年度報告顯示，俄羅斯的政治權利為次低等級的 6，公民自由等級則為 5，已經連續兩年被評比為不自由國家。（俄羅斯自由程度之變化，詳見表一）

有學者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在接受共產主義之前，社會上曾經施行過民主，具有民主的本質與背景，則其再次民主化的結果應是良好的（如波羅的海國家）<sup>87</sup>；反之，倘若社會上並未存在過民主的傳統，則民主化將會傾向於不良的後果。<sup>88</sup>由於俄羅斯過去在接受共產主義之前，並未有過民主的經驗，因此，如何處理共產主義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al）後果，是民主化進程的一項重要議題。<sup>89</sup>

俄羅斯被列為不自由國家最有力的理由是：俄羅斯人民不能以民主方式來改變他們的政府。於 2000 年普欽上任之初，人民便針對是否可以民主地改變他們的政府提出質疑。特別是在國家廣泛的控制傳播媒體、持續騷擾反對黨以及其財政上的支持者這些行為發生之後。值得關注的是：俄羅斯在民主化後，不但需要妥善處理共產主義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政治—文化後果，更需要應付政治與經濟上一連串的重大問題。以下主要參考「自由之家」的觀察，從選舉、政府、司法、新聞媒體、宗教信仰、集會結社等議題來說明俄羅斯目前的現況及其所面臨的問題。<sup>90</sup>

註 85 俄羅斯行政權獨大的憲政設計，使國會的制衡力量處處受限。因此，有心從政的人士往往認為，攀附行政權貴比投身政黨深耕基層，來得便捷有效。請參見林永芳，「俄羅斯政黨體系與民主化」，「2005 台北莫斯科論壇：全球化下的台俄關係」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民國 94 年），頁 4。

註 86 請參見 George W. Breslauer, *Gorbachev and Yeltsin as Lea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42~143.

註 87 波羅地海國家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後，各自展開了民主化的進程。依據「自由之家」2006 年全球自由報告，上述國家最新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評比均獲得最高等級的 1，顯示出社會的民主傳統對於民主化正面發展的重要性。請參閱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6/charts2006.pdf>.

註 88 請參見 Stephen White, "Russia's Troubled Transition," in David Potter, David Goldblatt, Margaret Kiloh and Paul Lewis, eds.,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pp. 435~440.

註 89 參考 Heywood, *op. cit.*, p. 33.

註 90 參閱「自由之家」2004 年與 2005 年世界各國自由年度調查報告，其中有關俄羅斯的部分。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0&year=2004&country=6818> 及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0&year=2005&country=6818>



### (一) 選 舉

在先前 1999 年下議院的國會選舉中，儘管有一些不正當的行為發生，包括存有偏見的新聞報導等，一般仍被認為是自由與公平的選舉。但是到了 2003 年的國會選舉，這些問題卻更加嚴重與氾濫，反對黨批評媒體對於他們競選活動扭曲與不公的新聞報導，使其無法進行理念的傳達以獲得公平的選舉結果，而這也是媒體被政府控制的結果。另外，早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就充斥著如此不當的行為。而且關於普欽勝選原因的分析，都是具有偏見的新聞報導，因為這些媒體都受到國家與克里姆林宮支持者的控制。再者，到 2004 年為止，仍持續禁止學者與學術界人士參加選舉活動。2005 年車臣的國會選舉，人權團體則控訴指出：不安全和持續的違反人權的情況，導致車臣無法舉行一個自由和公平的選舉。<sup>①</sup>

### (二) 政 府

貪污及賄賂問題在政府與企業界是普遍存在的。俄羅斯在 2004 年國際透明組織的貪污調查指數中，於全球 145 個國家中排名第 90。另外，2003 年尤柯斯能源公司主席柯多爾科夫斯基以及他的合夥人被逮捕，以及後來媒體老闆被騷擾與起訴都證實了許多俄羅斯獨立分析家的看法：普欽的反貪污作為，是選擇性適用以及時常針對那些批評政府與新興的政敵身上。另外，政府採取一些限制居住與遷徙自由的命令，所有成年人旅行時都被要求攜帶國內護照。而有些地方政府更以居住登記法來限制人民自由選擇居住處所的權利，甚至使有些人必須賄賂官員才有辦法辦理居住申請或通過申請文件的抽查，特別是高加索人或深膚色的族群。

### (三) 司 法

俄羅斯的司法體系基本上受到行政部門極大的影響，不但經常發生貪污與收受賄賂的情形，也缺乏適任人員。司法部門很少違背總統的意志，由於檢察總長是由總統提名，因此針對反對總統的異議人士的起訴時有所聞，這使司法體系的獨立性受到很大的質疑。<sup>②</sup>另外，政府當局也曾突然搜查為政治反對陣營亞伯羅柯（Yabloko）黨工作的選舉顧問公司辦公室。該黨是數個自由團體之一，並且受到石油商人與柯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支持。2003 年 10 月 25 日柯多爾科夫斯基的被逮捕顯示出司法體系的政治化。在逮捕之前，柯多爾科夫斯基的合夥人列別介夫（Platon Lebedev）已經先在 7 月 2 日入獄。在柯多爾科夫斯基被逮捕之後，他與合夥人在尤柯斯所擁有的資產百分之四十四已被政府凍結。普欽政府如此的行徑引起國家進一步侵佔私人公司的恐慌。而在發動逮捕後，總統的幕僚長也隨同辭職。根據消息顯示，這是經過激烈的政策鬥爭後，強硬派安全局與軍方獲得勝利的結果。<sup>③</sup>上述政府當局與司

註① 同註 70。

註② 請參見 Vladimir Ryzhkov, "The Liberal Debat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2004), p. 53.

註③ 請參閱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4/countryratings/russia.htm>.



法機關的搜查及逮捕行為，強化了法律是臣屬於政治考量以及司法並非獨立的認知。

另外，政府當局指控部分學者洩漏國家軍事機密給他國，並且由司法機關加以起訴。然而，人權團體廣泛地譴責這個判決，並認為它建立在政府企圖限制學者之間國際合作的虛偽指控基礎上。<sup>90</sup>

再者，雖然在近幾年，人民的財產權已經持續獲得法律保障。不過，分析家卻認為司法機關對尤柯斯集團擁有者的起訴與政府當局史無前例的凍結該公司的資產，都被視為打壓自由市場經濟的預兆。

#### （四）新聞媒體

在言論與媒體自由部分，雖然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但是俄羅斯政府持續地對批評克里姆林宮的媒體施壓，使言論自由受到相當程度的打壓。俄羅斯政府在 2001 年 4 月與 2002 年 1 月控制了另外兩個獨立電視網 NTV 與 TV-6，而俄羅斯內部最後一個獨立的全國性電視網 TVS，也在 2003 年 6 月被政府查封。至此，俄羅斯所有全國性電視網，不是被政府掌控，就是遭到偏袒政府的企業所操控。另外，政府當局也以媒體未獲批准逕自報導有關恐怖主義事件為由，而經常地以「關閉該電台」威脅媒體。<sup>91</sup>在新聞自由的其他方面，為了禁止出版或傳播的資訊會造成候選人正面或負面印象，普欽政府進一步以法律禁止記者報導非法的競選活動。上述法律意謂著政府在壓抑選舉期間一個不受限制的，對於政策、政府官員、政綱與候選人討論的平台。雖然後來憲法法庭宣告該法律不合憲，但已經造成媒體對於政治人物與政治報導的寒蟬效應，而使得自由權進一步受到限縮。

最令人擔憂的是，俄羅斯的記者也不時成為被攻擊與暗殺的目標。一位以報導組織犯罪與地方政府貪污而聞名的報紙編輯史陶洛夫（Sidorov）便在他的公寓外被謀殺。2002 年 4 月他的繼任者伊娃洛夫（Ivanov）也在自家外被謀殺。在車臣共和國的戰爭開打之後，普欽政府持續頒佈一些限制令，禁止大部份記者進入戰區，只同意那些被認定為效忠政府的記者進入。<sup>92</sup>隨著媒體受到政府越來越嚴厲的控制，網路相對之

註 90 2004 年 4 月，俄羅斯科學院美國及加拿大學院莫斯科分校的軍事科技及軍事經濟政策部主任 Igor Sutyagin，因洩漏國家軍事機密給英國及美國情報單位而遭控，並判處十五年徒刑。Sutyagin 否認此項控訴，宣稱其所用來研究的資料為已經解密的資料來源。人權團體廣泛地譴責這個判決，宣稱它建立在政府企圖限制學者之間國際合作的虛偽指控基礎上。在 11 月，物理學家 Valentin Danilov 被控洩漏太空機密給中國，必須在西伯利亞監獄服刑十四年。Danilov 稍早有一個有陪審團的審判中被認定是無罪的，但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決並在 2004 年 6 月作出新的有罪判決。請參閱「自由之家」2005 年世界各國自由年度調查報告，其中有關於俄羅斯的部分。<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2&year=2005&country=6818>。

註 91 在 2002 年，俄國當局曾因為一家電視台宣傳恐怖主義而暫時性的關閉該電視台，也因為一家電台以電話訪問挾持人質者而威脅關閉該電台。請參閱「自由之家」2005 年世界各國自由年度調查報告，其中有關於俄羅斯的部分。<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2&year=2005&country=6818>。

註 92 其他事件還包括了，在烏蘇里斯克（Ussuriysk）的平民法院，要求提早釋放巴斯柯（Grigory Pasko），他是一位記者被政府控告從事間諜活動，並被判四年徒刑。媒體自由組織認為，該控告有罪是出於政治動機，為的是要懲罰巴斯柯報導俄羅斯海軍傾倒核廢料事件。詳情請參閱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4/countryratings/russia.htm>。



下，是較具獨立性而可廣泛獲得資訊的工具，然而卻只有百分之四點二的民衆使用，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仍然無法接收到公正、客觀的資訊。<sup>⑦</sup>在2005年，俄羅斯 *Izvestiya* 報社的編輯被警告不要惹火了克里姆林宮的當權者，結果 *Izvestiya* 對2005年車臣的選舉報導據說就不再具有那麼強烈的批判性。<sup>⑧</sup>

### （五）宗教信仰

宗教自由在這個以東正教為主流的國家來說是很少受到尊重的。在1997年的宗教法要求教會在允許獲得註冊之前必須先證明他們已經存在了十五年。地方政府常常騷擾非傳統的宗教團體，如耶和華見證人、摩門教就常常成為被騷擾的目標。外國的宗教工作者常被拒發簽證而無法到俄羅斯。在最近幾年，羅馬天主教已經被驅逐、阻止進入或拒發簽證。在一名車臣女性恐怖主義者所策劃的自殺攻擊事件中，一些人權團體就宣稱在一些主要的城市市中心穿戴伊斯蘭頭巾的婦女，常常因此遭到騷擾或被未經授權的警察盤查。由此可見，人權與宗教自由的保障在俄羅斯仍然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 （六）集會結社

大體上，俄羅斯政府尊重集會與結社的自由。但是2001年7月公布的一項法律限制了政黨的數量，並要求政黨必須至少有一萬名黨員才可辦理登記，同時在全國89個區域中，每個區域都必須至少有一百位黨員。在2002年國會通過一項法律賦予政府當局有權去終止成員中有被控告為極端主義者的政黨與非政府組織。該法被批評為賦予政府極大的空間去定義極端主義，同時也給政府很大的自由去壓制合法的政治性反對運動。任何跟政府持不同立場的政黨或組織，很有可能在政府控告其為極端主義者之下，輕易地遭受解散或壓迫。此種措施對於人民的集會結社權造成很大的傷害。另外，普欽在2004年5月的全國性演講中，更明確抨擊部分非政府組織「接受國外組織、基金會的資金贊助」。同年，俄羅斯內部的人權團體也遭到批評，反對者認為人權團體所作所為違反了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而部分人權團體的辦公室甚至遭到攻擊。2005年莫斯科警方驅離參加宗教示威的群眾，並逮捕拘禁了一些人。<sup>⑨</sup>

從以上的觀察及描述，吾人發現自普欽上任以來，俄羅斯的自由程度，即各方面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雖不斷惡化，但人民似乎不以為意，究竟原因為何？主要可從下列各方面探討。首先，在葉里欽時代從事各項激進的改革，讓人民產生一種期待，認為可在一夕之間將俄羅斯建立成一個與西方國家等同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然而這些改革不但沒有達成，反而造成的國家混亂、犯罪高漲、社會不安與經濟不公等現象，使人民陷入極度的失望與不滿。再加上政治上的惡鬥與混亂，使過去支持反對黨的民衆轉而支持普欽，甚至將普欽視為俄羅斯民主的領導者；而有關

註⑦ 參見 McFaul and Petrov, *op. cit.*, p. 24.

註⑧ 同註70。

註⑨ 同前註。



反對黨抗爭與阻礙議事運作的舉動，反而成爲民衆心中動亂的來源，民衆渴望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者與政府來穩定這種不安的局面，進而領導俄羅斯恢復過去的光榮歷史與社會穩定。<sup>⑩</sup>普欽就任後一連串的作爲，使人民認爲他們找到了可以期待的對象，而這樣的心態便使普欽即使採取一連串違反自由民主原則的行爲，仍不至於受到人民太大的反對，反而人民期待透過普欽的作爲，能使俄羅斯恢復過去的安定與輝煌的歷史。<sup>⑪</sup>

因此，在俄羅斯國家政治、經濟均受到重大衝擊的背景下，普欽可以有效且廣泛地實施他所謂的「管理式民主」(managed democracy)<sup>⑫</sup>，且受到國內人民普遍的支持。雖然此種民主並非真正的民主，但在俄羅斯人民心中，這種改革形象，卻深受歡迎。<sup>⑬</sup>然而，如果吾人從民主鞏固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從蘇聯解體到目前爲止，其民主運作過程呈現出：在葉里欽時代由威權政體往「選舉的民主」前進，但普欽時期所採取的一連串危害自由民主的措施，卻使自由程度倒退回威權統治時代的等級。不管在民主政治、公民權利與人權等普世價值上，俄羅斯都發生了從葉里欽時代開始好轉但到了普欽時期卻反而惡化的現象。從「自由之家」最近幾年對俄羅斯自由程度的評比不斷下降，便可看出端倪。2004 與 2005 年最有意義及明顯的改變就是俄羅斯的評比從部分自由降級爲不自由，因爲政治權利的評比從第 5 級惡化到第 6 級。這個倒退反映出最近一次國會與總統選舉的瑕疵，國家對媒體控制的強化，以及反對陣營的政黨與團體原本可享有的政治自由受到更多限制。俄羅斯被列入不自由國家的範疇代表普欽總統逐漸朝向集權的趨勢，媒體的限制及強制性法律體系的政治化已達到頂點。與從 1997 年到葉里欽總統任期結束時相較，俄羅斯自由的惡化是很清楚的。當時，俄羅斯的政治權利的評比爲第 3 級，公民自由爲第 4 級；目前的評比分別降級爲第 6 級與第 5 級。<sup>⑭</sup>

## 伍、台灣與俄羅斯民主發展之比較

我們在討論民主鞏固概念時曾提到，無論是 O'Donnell 與 Gunther 等人在 *Journal of Democracy* 上的爭辯，或是 Schedler 提出有關民主鞏固的各種類型，其實都涉及到民主轉型的階段、民主政治的類型乃至於民主政治的測量問題。因此，本章除了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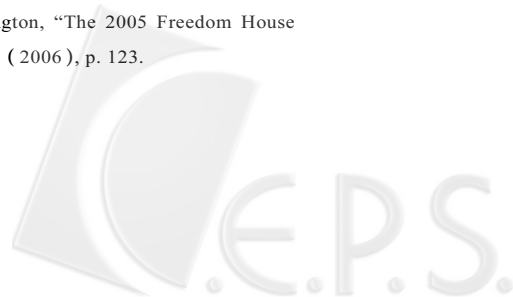
註 ⑩ 請參見 Yuri A. Levada, "What the Polls Tell U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2004), pp. 50-51.

註 ⑪ 請參考 Ryzhkov, *op. cit.*, p. 54.

註 ⑫ 普欽曾表示他支持民主，但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所謂管理式的民主，意味著是一個強有力的官僚體系。請參閱 Levada, *op. cit.*, p. 46.

註 ⑬ 在一項民意調查中顯示，俄羅斯人民對於民主的真正意涵與價值並沒有太多正確的認識，很容易將民主與改革聯繫在一起，進而促使俄國人民認爲普欽是一位他們心中所想要的與理想的改革者。也因此很難相信普欽不會利用這種政治形象來建構他的支持基礎，爲他的施政取得合理化的藉口。請參閱 Nadia Diuk, "The Next Gener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2004), pp. 59-66.

註 ⑭ 參考 Puddington and Piano, *op. cit.*, p. 105. Aili Piano and Arch Puddington, "The 2005 Freedom House Survey: Progress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 1 (2006), p. 123.





步闡述這三種模型的標準外，大致上也將以這三種模型標準來比較台灣與俄羅斯民主發展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種模型的觀點並非互相排斥而是具有相互補充與解釋的作用。

## 一、民主轉型的模型

有關民主轉型的階段歷程，早在 1970 年 Rustow 就提出一個模型，後來 Sorensen 據此稍加修改，用來描述轉型過程中的主要因素，試圖使研究者能夠獲得更具體的幫助（見圖二）。<sup>⑤</sup>該模型從國家統一的背景條件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由非民主統治轉型到民主階段的過程，但在實際世界中各階段經常重疊。民主轉型的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是以政治鬥爭導致非民主政權瓦解為特徵；第二個階段是決定階段：民主秩序的明確要素已經建立；最後一個階段為鞏固階段：新的民主進一步發展，民主習慣已確立為政治文化的一部份。<sup>⑥</sup>

就台灣政治發展過程而言，自由化和民主化是二個不同但卻緊密相連的階段。<sup>⑦</sup>漸進的經濟與政治自由化導致了民主化，即從自由化的成長，轉而要求進一步的民主化，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穩定建立。<sup>⑧</sup>因此，我們從 Rustow 民主轉型的模型來看：台灣從 1986 年民進黨成立或 1987 年蔣經國總統宣佈戒嚴令解除才開始啟動自由化；繼而經過 1991、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和 1996 年總統直選的民主化實踐，成功進行了民主轉型，且於 2000 年通過民主鞏固政黨輪替的嚴峻試煉；由民主起步的準備階段，歷經民主轉型的決定階段，進而到達民主鞏固的初期階段，但是尚未達到完全的鞏固，因為民主的規範尚未在台灣各個層面普遍習慣與適應，唯有民主深植於人心並由衷地信

註<sup>⑤</sup> 請參見 Rustow, *op. cit.*, pp. 350~361; Sorensen, *op. cit.*, p. 40.

註<sup>⑥</sup> 請參閱 Sorensen, *op. cit.*, p. 40, p. 45. 另外，有學者將台灣民主歷史的進程分為三波：1. 民主起步階段；2. 民主轉型階段；3. 民主鞏固階段。參見阮銘，*民主台灣 vs. 共產中國*，頁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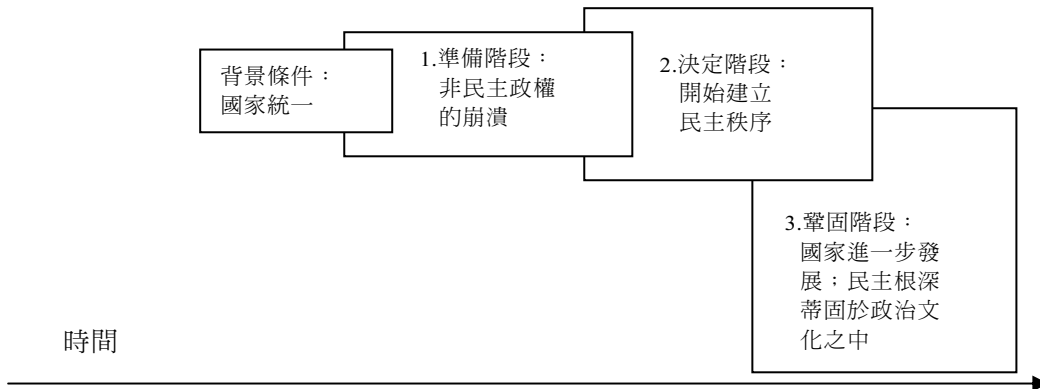
註<sup>⑦</sup> Guillermo O'Donnell 與 Philippe C. Schmitter 早在 1986 年就已經正確地堅持區別自由化與民主化。政治自由化指涉的是在威權政體內壓制的舒緩與公民自由的擴張，而民主化指涉的是轉向民主政治的運動，亦即轉向不同的政治體制。自由化並不總是導引至民主的轉型。請參見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78; Mainwaring,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 298. 而 Juan J. Linz 與 Alfred Stepan 亦強調應該清楚區別自由化與民主化。自由化是指在非民主政體的機制之下可能伴隨一些政策與社會變遷，例如比較少的媒體檢查，有時候給予自主性勞工運動較大的空間，引介一些諸如人身保護令 (*habeas corpus*) 的個人防衛，釋放大多數的政治犯，讓被放逐者回來，更重要的是容忍反對人士。民主化需要自由化，但更廣泛也更具有特別地政治概念。民主化需要自由競爭的選舉以決定誰統治。使用這樣的定義，很明顯地有可能自由化，但沒有民主化。參見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

註<sup>⑧</sup> 請參見 Mahmood Monshipouri, *Democr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 Human Rights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p. 16.



服民主制度，民主政體才能說是完全穩固。<sup>109</sup>

圖二 民主轉型的一個模型



資料來源：Georg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2nd e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p. 40.

然而，俄羅斯的情況卻非如此。儘管俄羅斯曾經在 1996、2000 以及 2004 年分別舉行總統大選，但是在這三次的總統選舉中，我們只看到強勢候選人（葉里欽與普欽）最後以極大的差距擊敗競爭對手，都以獲得過半數的支持選票順利當選總統。至於其他候選人的得票，不管是共黨候選人或者是獨立候選人，其實都無法對葉里欽與普欽造成威脅。一方面，這是因為俄羅斯尚未真正建立起民主、公平的選舉規則；另一方面，現任者的打壓作為，也成為反對勢力必須面臨到的最大障礙。在不公平待遇下，反對黨候選人無法透過公開而自由的管道宣揚政治理念以贏得支持，同時支持者受到政府的打壓也產生寒蟬效應，而使得反對黨的支持者在壓力下選擇沈默或放棄支持。

若以 Sorensen 的模型來看，在蘇聯的非民主政體宣告崩潰後，俄羅斯大致已經完成了準備階段的民主轉型任務。然而，俄羅斯在過去十年來所舉辦的三次總統大選，卻無法幫助俄羅斯制定真正公平的遊戲規則。換句話說，在決定階段中，俄羅斯仍無法建立起民主秩序。不管是越來越嚴密的中央集權現象，或者是越來越受束縛的公民政治權利，都使俄羅斯無法順利跨進民主鞏固的階段，甚至產生退化的現象。與台灣和平完成政權轉移的情況相較之下，俄羅斯在民主的進程上，顯然落後台灣許多。

註<sup>109</sup> 請參閱李西潭、張孝評，「台灣民主化分析——Rustow 與 Huntington 模式的檢驗」，頁 68。在「2001 年選舉與民主化研究」學術研討會中，有學者研究指出：檢視台灣過去十年來，民眾對於政治人物的信任、對自我政治功效意識的提昇、以及對民主基本原則的尊重，是促進政黨競爭、政權和平轉移、以及社會安定的重要心理基礎；開放且自由競爭的選舉，對於民眾的政治功效意識的確有正面的影響；所以，一個健全的民主國家，需要建立在民眾具有較佳的民主素養上。請參見陳義彥、陳陸輝，「政治功效意識、政治信任感以及台灣選民的民主價值」，2001 年選舉與民主調查研究研討會（台北：「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民國 90 年），頁 23。

## 二、民主的類型與民主鞏固的模型

如前文所述，<sup>⑩</sup>在討論「民主鞏固的各種概念」時，特別提出包括「威權主義」、「選舉的民主」、「自由的民主」與「先進的民主」等四種不同層次的分類法。

Schedler 強調，民主鞏固的過程其實就是國家在時間序列上，避免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進而邁向更穩定之民主制度的過程。這種以「經驗性觀點」及「規範性水平」等兩項因素來列舉不同意涵的民主鞏固概念，確實有其參考價值。其中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組織民主」(organizing democracy)的概念。<sup>⑪</sup>在這個階段裡，除了要求建立比單純制度化民主國家更多的基本規則，(自由的民主)國家還希望在這個階段裡建立起民主的特殊制度與組織，包括對政黨制度、行政官僚、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各項利益協商的機制等等(見圖三)。換言之，「組織民主」等同於「制度建立」(institution building)，也是 Philippe Schmitter 所說的「部分建制」(partial regimes)。<sup>⑫</sup>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國家在「組織民主」的過程中，可能因為建立正確的政治制度，而走向「先進的民主」；然而，卻也有可能因為採用錯誤的民主制度，而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反而回到「選舉的民主」，甚至是「威權政體」的階段。<sup>⑬</sup>

圖三 組織民主



從「自由之家」的評比來看，自從台灣於 1996 年舉行總統直選以後，連續十年被歸類為「自由的民主」國家。2000 年的總統大選後，台灣不但完成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而政權的和平轉移，也讓台灣踏穩了民主鞏固的第一步。若以「自由之家」的評

註<sup>⑩</sup> 請參見 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p. 93~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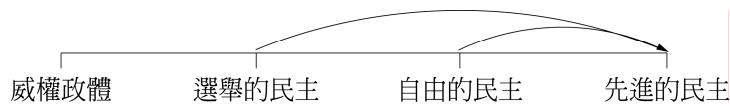
註<sup>⑪</sup> 另外四種民主鞏固的概念定義如下：防止民主崩潰 (preventing democratic breakdown) 就是防止「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快速死亡，倒退回原來的威權主義。避免民主崩潰，專心致力於民主體制長存下來，乃是民主鞏固的古典意義；防止民主腐蝕 (preventing democratic erosion) 乃防止「自由的民主」慢慢死亡。除了崩潰的危險，許多新民主政體必須抵禦民主衰敗的危險，避免民主逐漸腐蝕，導致半民主體制 (semidemocracy) 的發生；完成民主 (completing democracy) 乃是指從「選舉的民主」到「自由的民主」。民主化的完成需要去除威權主義的餘毒，而「自由的民主」必需有效地保證基本的政治、公民與人權 (political, civil and human rights)；以及深化民主 (deepening democracy) 乃是討論民主品質從「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提昇到「先進的民主」之水準。請參見 *Ibid.*, pp. 93~105.

註<sup>⑫</sup> 請參考 *Ibid.*, pp. 100~101; Philippe C. Schmitter,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 in Richard Gunthe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and Hans-Jürgen Puhle, eds.,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84~314.

註<sup>⑬</sup> 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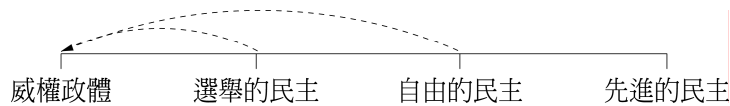
比來對照 Schedler 的民主進程模型，此時此刻，台灣現在最重要的工程，乃是如何依據「自由的民主」之程序、架構，進一步落實憲政體制、選舉與政黨制度的改革。換言之，台灣應該積極進行「組織民主」的憲政工程，以避免發生民主腐蝕與崩潰的情形，朝著邁向「先進的民主」國家之列而努力。而當前與未來最重要的工作，即是進行民主的深化，透過提昇民主政治之品質，從自由的民主國家朝著成為先進民主國家之目標邁進（如圖四所示）。

圖四 民主深化



相較之下，俄羅斯雖然在 2000 年同樣完成民主、公開的總統選舉，但是「自由之家」只將俄羅斯評比為「部分自由」的國家。換言之，俄羅斯應該只屬於 Schedler 所歸類的「選舉的民主」國家。無論在政治權利或公民自由的部分，俄羅斯都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從普欽即位以來，俄羅斯不但沒有落實進一步的民主化，以求成為「自由的民主」國家；相反地，誠如前文所述，俄羅斯因為一連串的政治壓迫與限制行為，反而引發了民主倒退，甚至是民主崩潰的危機。在「自由之家」於 2005 年公布的報告中，俄羅斯被評定為「不自由」的國家，再次顯示俄羅斯已經重回「威權政體」之列。換句話說，俄羅斯雖然一開始由威權政體朝向民主化的方向——「選舉的民主」前進，但是她並沒有在總統直選之後進一步往「自由的民主」邁進，反而發生倒退的現象，又重新回到威權政體。政府透過一連串立法與行政手段限縮人民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打壓反對人士，進一步去鞏固領導者的統治權力，而造成了俄羅斯民主的崩潰（如圖五）。

圖五 民主崩潰



### 三 「自由之家」的測量

「自由之家」每年對全世界所有國家的自由程度進行評比，其評比結果一直都會

到國際社會的肯定與重視。而其用來評判各國自由程度之調查指標（詳見附錄），也成為各國在進行民主鞏固與民主深化之工程的參考依據。<sup>19</sup>而從1995年至2005年，「自由之家」對台灣與俄羅斯在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上的評比，詳如表一。

表一 台灣與俄羅斯的民主自由程度：「自由之家」的評比（1995～2005年）

項目 年代	台灣		俄羅斯		自由等級	
	政治權利	公民自由	政治權利	公民自由	台灣	俄羅斯
1995	3	3	3	4	部分自由	部分自由
1996	2	2	3	4	自由	部分自由
1997	2	2	3	4	自由	部分自由
1998	2	2	4	4	自由	部分自由
1999	2	2	4	5	自由	部分自由
2000	1	2	5	5	自由	部分自由
2001	1	2	5	5	自由	部分自由
2002	2	2	5	5	自由	部分自由
2003	2	2	5	5	自由	部分自由
2004	2	1	6	5	自由	不自由
2005	1	1	6	5	自由	不自由

根據「自由之家」從1972年的評比，台灣在這三十多年來的自由程度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重要階段：1972年，台灣兩項分別為第六等、第五等，列為不自由國家。1976年，「政治權利」升為5，「公民自由」不變，首度列名「部份自由國家」。爾後由

註<sup>19</sup> 「自由之家」所用的指標，並非完美無缺，**民主思想百科全書**曾列出以下學者所提出的質疑：1. 大多數民主體制宣稱是自由民主，雖然理論上可能是協和式或參與式民主，但尚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建立在這些原則之上。不過，若將焦點放在自由民主的內在價值，就必須排除社會與經濟利益，這樣一來可能被視為有其弱點，尤其是非常貧窮的社會，極端貧窮使得參與民主或甚至於享有自由權利與保護變得不可能。2. 自由民主的限定太過於狹窄，大致上其焦點包括測量垂直式的負責與形式上的政治權利，藉由這樣的測量標準，西方先進工業國家皆獲得相當高或完美的分數；沒有更敏感的指標，使得第一世界一再重複接受對於他們政治品質相同頂端與完美的分數。3. 民主的指標實際上不能測量負責性或政治權利或行政壓迫，單純地因為這些價值存在於抽象概念的水平無法精確量化；例如負責性的測量指標是自由與公平的選舉，但“自由”與“公平”的語詞是難以界定的工作。4. 測量民主的指標停留在國家層次，忽視次國家領域的民主品質，民主品質亦不能考量未成年與殘障者所受到的對待。5. 事實上，大多數指標建立在狹窄的資料來源上面。例如大多數西方新聞來源為**紐約時報**；這些資料最完整也有用，但做為民主的指標則可能產生系統性的偏差。6. 政治偏差的問題可能發生在「自由之家」的指標，美國國務院與國際特赦組織皆被控訴偏差。「自由之家」對於個別國家，如波蘭或南非顯示特殊的偏差。7. 用來標示自由、部分自由與不自由的平均分數其評量標準通常留下無法證成的部分。同時，測量的技術本身可能影響評量的標準。請參考 Clarke and Fowerake eds., *op. cit.*, pp. 351~354. 然而，在兩國民主程度的測量與比較上，筆者仍然認為以採用「自由之家」的指標較為適當。因為在進行兩國的比較研究時，必須有一客觀、公正的評量標準，否則比較將失其準據。雖然有學者對於「自由之家」的指標提出質疑，或認為其對一個國家的可能表現與狀態，只能提供大致的概況，但由於「自由之家」為國際社會上一頗具公信力的非營利組織，且自從1970年代起便對世界各國的自由程度進行評比，其資料可謂極為完備，故筆者將它做為兩國比較的主要基準。

於解除黨禁及報禁、開放赴大陸探親等，自由度逐漸上升。1990 年的兩項評比都晉升為三，仍屬「部份自由國家」。台灣自從 1996 年 3 月總統大選後，即被列入既是「選舉的民主」國家，也是「自由的民主」國家之行列；民主政治的精髓在於人民有權利，透過定期、公開、公平與自由的全國性大選，選擇統治者。所以，此次台灣所完成的總統直選，不但是民主化的關鍵，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里程碑。<sup>⑩</sup>

2000 年總統大選完成了第一次政權的和平移轉後，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權利更進一步提升，被評定與日本並列為亞洲地區最自由的國家（平均指數為 1.5）。<sup>⑪</sup>台灣民主化的進展此時已經超越許多被列為「選舉的民主」之國家，且自由等級的排名列在南韓、菲律賓等亞洲更早民主化國家的前面。根據 2002 年的評比，在亞太地區 18 個自由的民主國家中，台灣與南韓、泰國被列為過去十年除了經濟發展令人印象深刻，且伴隨著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擴張，因而挑戰了所謂「亞洲價值」中威權政體與經濟發展必然相結合的論調。<sup>⑫</sup>在 2004 年底公布的評比中，台灣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評比分別為 2 與 1，與日本（政治權利 1，公民自由 2）並列成為亞洲最自由的國家。<sup>⑬</sup>而在 2005 年底最新公布的評比中，台灣更首度被評比為第一等級的最自由國家，即「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項指標均獲得最高等級的 1，與美國、英國等其他四十九個國家並列為全球民主及自由度最高的國家。<sup>⑭</sup>

然而，若我們同樣以「自由之家」的評比來解釋俄羅斯的民主發展歷程，我們將會發現俄羅斯的民主制度在公元 2000 年之後明顯出現崩潰的趨勢。當台灣於同年和平轉移政權之時，普欽也得到超過半數的人民支持，擊敗競爭對手久噶諾夫。儘管如此，普欽卻也開始一連串的政治迫害行動，不但透過政治手段免去了 89 個省長的職務、削弱部分企業家的政治影響力，同時還強制接管國內的主要媒體與獨立電視網。除此之外，俄羅斯政府當局也逐步限縮媒體記者的報導範圍，甚至在競選期間還立法禁止出版或傳播會造成候選人正面或負面印象的資訊。雖然憲法法庭最後宣告該法律不合憲，但是已經造成媒體對於政治人物與政治報導的寒蟬效應。

註<sup>⑩</sup> 請參見 Karatnycky, *op. cit.* (1997), pp. 3~8, 475~477, 584; Karatnycky, *op. cit.* (1998), pp. 487~489; Karatnycky, *op. cit.* (1999), pp. 112~116; Karatnycky, *op. cit.* (2000), pp. 468~470; Karatnycky, *op. cit.* (2001), pp. 5~15, 521~524; 李西潭，「從民主化相關概念探討台灣民主轉型的歷程—兼論孫中山建國三程序的意義與作用」，*政治學報*，第 29 期（民國 86 年 12 月），頁 141~192；李西潭，「邁向鞏固的民主：台灣案例」，*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5 卷第 2 期（民國 86 年 6 月），頁 161~196；李西潭，「全球化、民主化與兩岸未來」，2003 *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國 92 年），頁 177。

註<sup>⑪</sup> 台灣自由程度在政治權利方面的等級是“1”（因為自由、公正的總統選舉和有秩序的政權移轉，使台灣評等首次提昇至第一級）；公民自由方面的等級是“2”（雖然沒有異動，但陳定南的掃黑行動也使台灣被推舉為全世界五大自由進展國家之列），自由等級首次超越南韓（2.0）。參見 Karatnycky, *op. cit.*, (2002), pp. 108~109.

註<sup>⑫</sup> 請參見 Karatnycky, *op. cit.* (2003), p. 103. 另外，2003 年的調查報告指出：台灣已經順利完成政治上的進展，並有令人欽佩的經濟成長率，且又是亞洲地區十七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之一。參見 Adrian Karatnycky, “The 2003 Freedom House Survey: National Income and Liber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1 (2004), p. 85.

註<sup>⑬</sup> 請參閱 Piano and Puddington, *op. cit.*, pp. 119-124.



除了政治自由受到約束，人民的結社自由也受到壓迫。俄羅斯政府於 2001 年與 2002 年陸續通過立法，限制政黨的成立與維繫，並且賦予中央極大的權力能夠終止特定政黨的存續。在 2002 年通過的勞工法規中，又限制了勞工的罷工權利，使工會的存在形同虛設。尤有甚者，人民的遷徙與居住自由也受到政府的限制，而國內的少數民族更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對待。另外，2003 年國會大選後，支持普欽政權的團結俄羅斯黨已獲得國會席次的絕對多數，反對黨式微，國會對行政部門監督制衡的意義消失，形成了一個不具競爭性的政黨體系，也是民主倒退的原因之一。<sup>⑩</sup> 正因為這些打壓作為，俄羅斯人民在葉里欽擔任總統一職時，原本享有之第四級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程度，在普欽贏得總統大選之後，滑落到第五級。在最新公布的評比報告中，俄羅斯人民所享有之政治權利，甚至跌落到第六級；自由等級也從「部分自由」的國家，被調降為「不自由」的國家。<sup>⑪</sup> 這些都在顯示俄羅斯正在處於一個民主倒退的階段，她在「自由之家」的評比中的每一項都有嚴重的衰退趨勢。這樣的情況顯然與台灣邁向民主鞏固之路背道而馳。

#### 四、小 結

台灣與俄羅斯都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時，從威權（準列寧主義）或極權政體走向民主政體的國家。雖然兩國都是在一黨體制下推動民主化，而且自從 1996 年至今皆舉行過 3 次的總統選舉，但是兩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卻有截然不同的結果。依據歷年來「自由之家」的年度調查報告，1995 年兩國的自由程度曾經十分接近。當時台灣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項指標上的等級均為 3；而俄羅斯的「政治權利」等級為 3，「公民自由」等級則為 4。然而，從 1996 年至今為止，吾人發現前者持續往民主鞏固的方向發展，後者則面臨到民主倒退的問題。

自 1995 年以來，俄羅斯的民主發展從未被列入「自由的民主」國家，而始終維持在「選舉的民主」國家。由於其選舉過程，不僅欠缺廣泛的政治競爭和參與，亦缺乏實質的自由（如言論、出版等等）與多元主義，故僅是將民主視為選擇領導者的方法，無法使人民透過有意義的方式來形成與表達他們的政治偏好。<sup>⑫</sup> 普欽在 2000 年與 2004 年的總統選舉中，皆以極高的票數當選，但是這不代表人民已經透過有意義的方式來形成與表達他們的政治偏好。因為普欽所採取的一連串政治迫害行為，不僅使自由與公平的選舉無法落實，更造成反對黨拒絕參選的情形。因此，吾人認為普欽的高票當選，可能是反對黨拒絕選舉的反民主行為（antidemocratic behavior）所造成，未必代表俄羅斯人民有極高度的意願推選普欽為總統。<sup>⑬</sup>

從上述兩國民主發展的差異亦可得知，民主如果要獲得鞏固，政治行為者必須服

註⑩ 參考林永芳，前引文，頁 1。

註⑪ 請參考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32; Diamond, "Is The Third Wave Over?" p. 21.

註⑫ Schedler 針對反民主行為（antidemocratic behavior）提出的三項觀察標準如下：1. 使用暴力；2. 拒絕選舉；3. 違反權威。請參見 Schedler, "Measur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 70.



從憲法、法律，而且接受政治行為的規則。<sup>124</sup>自從民進黨執政以來，台灣的政局雖紛擾不斷，但由於主要的政治行為者，大致上均認同「司法是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原則，因而並未明顯妨害民主鞏固的發展。<sup>125</sup>反觀俄羅斯的政局，主要的政治行為者普欽總統不但「透過立法」推動一連串限制人民政治權利、公民自由的措施，甚至進而控制法官的任用與解雇，使憲法、法律成為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其行為根本不符合政治規則，故造成嚴重的民主崩潰現象。因此，一個民主政體是否能夠維持，主要決定於政治行為者的行為民主與否，而且行為比態度、結構因素更重要。<sup>126</sup>

另外，吾人認為 2000 年的總統選舉，可說是造成台灣與俄羅斯在民主發展上呈現重大差異的轉折點。因為從 Robert A. Dahl 多元政體（Polyarchy）的觀點來檢視，吾人發現 2000 年台灣總統選舉的過程，基本上呈現出廣泛的政治競爭及參與，並且充分保障實質的自由（如言論、出版等），以便能使人民透過有意義的方式來形成與表達他們的政治偏好。但是俄羅斯總統選舉的過程，雖然符合 Joseph A. Schumpeter 所提出的民主程序性定義，卻缺乏「自由的民主」所需具備的競爭、參與以及自由三項要素，因而只能被視為「選舉的民主」。<sup>127</sup>進一步觀察 2000 年台灣與俄羅斯總統的選舉，可知前者的反對黨有較充分的參與空間，而且在其民主化過程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中，民進黨的選舉活動基本上未受到國民黨政治上的打壓，而且反對派有機會經由選舉獲得權力或增加支持度；但後者的反對黨幾乎無參與空間，甚至出現前述拒絕參選的情形，而且在其民主化過程中一直未能形成有效的反對勢力，例如：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中，反對黨的競選活動受到媒體扭曲與不公的報導，使其無法進行理念的傳達以獲得公平的選舉結果，而且反對派可說沒有機會經由選舉獲得權力或增加支持度。

## 陸、結 論

在結論的部分，我們借用 Huntington 在**第三波**一書提到之五種類型的政權發展模式，對台灣與俄羅斯的民主鞏固結果作最後的分析比較。Huntington 提出之政權發展模式包括輪迴型、二次嘗試型、間斷民主型、直接轉渡型以及非殖民化型<sup>128</sup>，而台灣

註<sup>124</sup> *Ibid.*, p. 71.

註<sup>125</sup> 台灣做為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因為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政黨制度等有待進一步明確的規劃；政治領導、民主文化、人民民主素養、媒體專業性與中立性，以及司法獨立等民主品質皆有待提升。因此，新興民主國家常見的政治亂象顯然無法完全避免，但台灣卻依然被評為自由等級最高的民主國家，這或許應歸功於政治人物與社會大眾仍然堅守憲政程序（尤其是大法官會議解釋的權威性）與司法正義為大家共守的最後一道防線。

註<sup>126</sup> Schedler, "Measur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 85.

註<sup>127</sup> 有關多元政體的概念，請參考 Dahl, *op. cit.*, pp.1~32. 而關於民主的程序性定義是指「民主的方法乃是達成政治決定的制度安排，在此種安排下某些人相互競爭人民的選票以獲得決策的權力」。請參見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1976), p. 269.

註<sup>128</sup> 關於各型態的詳細介紹，詳見 Huntington, *op. cit.*, pp. 40~46.





與俄羅斯分別落在「直接轉渡型」以及「二次嘗試型」。

所謂直接轉渡型，是指穩定的威權體制透過漸進的演變，或者直接由民主體制取而代之的類型。台灣從解嚴後，開始進行自由化與民主化的相關工程。從1996年第一次民選總統，乃至於2000年的第一次政黨輪替，都是透過和平的民主機制完成的。因此，Huntington將台灣列為直接轉渡型的國家，確實有其合理之處。

而二次嘗試型，則是指實行威權體制的國家向民主體制轉移，但或許會因為國家缺少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或者是新興民主體制的領袖採取獨斷極端政策，因而造成民主體制宣告失敗，進而引發激烈反彈與社會動盪，最後導致該政權的瓦解。蘇聯解體後，雖然由民主化的俄羅斯取而代之，但是從過去十年的發展來看，俄羅斯的民主不進反退。缺少民主經驗的俄羅斯，突然轉型為民主政體，似乎顯得水土不服，也出現了Huntington對於二次嘗試型所描述的現象。雖然俄羅斯朝民主體制轉型，但其國內缺少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以及新興民主政體領袖採取獨斷極端政策，故使俄羅斯在民主發展過程中，產生退化的情形。普欽的獨裁專政，讓俄羅斯未來的民主發展蒙上一層陰影。現在俄羅斯的民主政體，顯然就是Huntington所說的不太穩定，且可能是短命的民主政體。但是否會進一步引發激烈反彈與社會動盪，最後導致該政權的瓦解，則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至於為何台灣與俄羅斯在民主鞏固的進程上會面臨到如此重大地差異？吾人認為可從兩者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所面臨到不同的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分別探討之。

就外部因素而言，台灣主要是受到強權國家在政策上轉變的壓力。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在戒嚴的情況下成立。美國參、眾議員曾要求蔣經國儘速「解除戒嚴令、允許創立政黨，並且全面改選國會」，同時還要求國民黨政府不可打壓民進黨的創立。由於美國的施壓，因此，民進黨順利創黨，台灣的民主化也從此正式展開。<sup>⑨</sup>而俄羅斯則主要受到與西方國家冷戰失敗的影響。冷戰的一項重要特徵是：不斷投入鉅資的軍備競賽。由於蘇聯並不像東歐國家一般大量地依賴對外貿易，加上在冷戰時期，蘇聯自行與國際貨幣體系隔離，無法與其他20國貨幣進行兌換，故使蘇聯自成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然而，面對1980年代後期蘇聯經濟成長的持續停滯，使政治菁英不得不正視內部經濟改革的問題。在這樣的內部環境下，為了取得西方國家的協助，使戈巴契夫在限武談判做出單方面的讓步，以及默許東歐國家脫離蘇聯的控制。接著，我們可以說：西方國家獲得了冷戰的勝利。因為蘇聯經濟改革的結果使它正當的削減國防預算，並且願意接受民主，結束與西方國家的對立。<sup>⑩</sup>因此，綜上所述，早在蘇聯解體之前，東歐各國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就已經無法扭轉。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擴散的結果之一，且隨著蘇聯帝國的瓦解，俄羅斯也開始了民主化的進程。

註<sup>⑨</sup> 請參見林佳龍，「解釋台灣的民主化」，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與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民國88年），頁121~122；李西潭，「台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民主的未來」，2005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台灣民主的挑戰與前景」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國94年12月10-11日），頁8。

註<sup>⑩</sup> White, *op. cit.*, pp. 433~434.



就內部因素而言，根據吾人的觀察，台灣與俄羅斯在民主鞏固進程上的差異，尚且包括如下五點：

1. 列寧式與準列寧式政體之差異：國民黨早期雖然曾經以一黨獨大、威權統治、中央專制的方式來治理台灣，然而，學者普遍認為台灣至多只是一個「準列寧式」的政體。因此，台灣具有較大的空間能夠從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政體。<sup>⑩</sup>然而，俄羅斯乃是一個標準的列寧式國家，其專制極權程度更高，在面臨民主化各種運動的時候，過去的思維不免會影響到在處理民主化議題時的行為，自然也會以更強硬的態度來處理。換言之，俄羅斯對於民主化的抗拒與經驗的缺乏，顯然會比台灣國民黨準列寧式政體的轉型來得艱辛。
2. 選舉經驗之差異：台灣從 1950 年開始舉辦地方選舉，全面落實地方自治。在這段期間，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開放省、縣（市）議員和縣（市）長、鄉（鎮）長等多項地方公職選舉。到了 1969 年，台灣開始進行包括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在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到了 1996 年，台灣更舉辦了首次總統直接選舉，並於 2000 年與 2004 年再次舉辦總統大選。換言之，台灣民衆的選舉經驗至今已經超過 50 年。相較之下，俄羅斯民衆的選舉經驗雖然也有 10 餘年的經驗（1991～2005 年）<sup>⑪</sup>，但俄羅斯的選舉實際上卻操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尤有甚者，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中，政策議題幾乎沒有被提出來討論。普欽僅提出十分模糊的振興經濟與提升國力的概念，並拒絕與對手同台辯論，而他的對手們也沒有針對具體政策進行批評。<sup>⑫</sup>另外，普欽在 2000 年上台之後，逐漸將各項權力集中到中央，在 2004 年的總統大選中，主要政黨（共產黨與自由民主黨）的領袖甚至拒絕參選，這無疑打擊了俄羅斯民主化的努力。<sup>⑬</sup>
3. 有無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向來都是一個國家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來源。根據統計，台灣的中產階級人數在 1970 年代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二。但是到了 2003 年，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人數，已經達到約百分之八十。<sup>⑭</sup>中產階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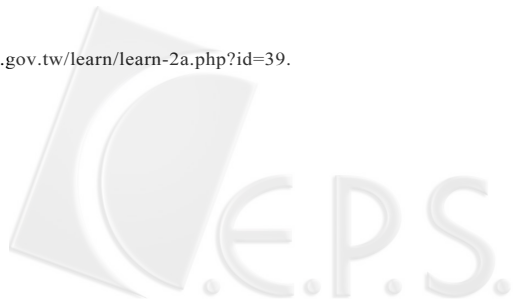
註⑩ 請參考 Chien-min Chao and Yeau-tarn Lee, "Transition in a Party-State System: Taiwan as a Model for China's Future Democratization," 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210~230.

註⑪ 請參考馬什 (Christopher Marsh), 「後共產黨時代的艱難旅程」, *二十一世紀評論*, 第 85 期 (民國 93 年), 頁 18~28。

註⑫ 請參考王定士, 「俄羅斯千禧年總統選舉研究」,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第 8 卷第 2 期 (民國 89 年 12 月), 頁 43。

註⑬ 同前註。此外，普欽在 2004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中，共獲得 71.3% 的選票，而其對手 Nikolai M. Kharitonov 卻只獲得 13.7% 的選票。相關分析報告，可參閱 *Journal of Democracy* 於 2004 年 7 月以「俄羅斯民主正遭受侵蝕」為主題，所收錄共六篇文章。分別是 McFaul and Petrov, *op. cit.*, pp. 20~31; Stephen Sestanovich, "Force, Money, and Plur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2004), pp. 32~42; Levada, *op. cit.*, pp. 43~51; Ryzhkov, *op. cit.*, pp. 52~58; Diuk, *op. cit.*, pp. 59~66; Shevtsova, *op. cit.*, pp. 67~77.

註⑭ 詳見張國龍, 「快速變遷社會中公務人員之自我定位」。http://www.rad.gov.tw/learn/learn-2a.php?id=39.



方面促使台灣的經濟起飛，成就了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另一方面，中產階級也發揮影響力，使台灣逐步進行民主改革，邁向民主化。然而，自從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中產階級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生活水準也直線下滑，甚至有些原本的富人還淪為貧民或乞丐。<sup>⑭</sup>根據統計，目前俄羅斯的中產階級數目約有一千萬人以上，但只佔全國人數的百分之八，明顯偏低。<sup>⑮</sup>當俄羅斯人連個人經濟生存都無法滿足時，自然也無力追求進一步的民主。

- 4.對於媒體之掌控與應付群眾運動之模式：在民主鞏固過程中，國家領導者的行為往往比態度及結構的因素更加重要。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是否能夠順利鞏固，主要取決於國家領導者的行為民主與否。<sup>⑯</sup>台灣從1987年解除報禁以來，各種平面媒體爭相設立，而1993年開放廣播、電視頻道之後，更擴大台灣媒體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到了2003年，立法院又通過廣電三法，以法律明文規定政黨與政務人員退出電子媒體，並且禁止黨工與公職人員主持新聞評論節目，使台灣的媒體能夠更超然地扮演監督政府運作的角色。從民主化開展以來，不論李登輝前總統或是陳水扁總統，都可被認為是民主的主要行動者。儘管在政治上他們傾向於強調台灣的主體意識，但並未以實際的違憲或違法行為去迫害不同意見者。因此，台灣的自由程度一直維持一定的水準，甚至於向上提升。此外，人民自發性的群眾運動，也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之一。儘管在戒嚴時期，台灣人民並沒有組織政黨，或者進行集會行動之自主權，但是在解嚴之後，政府逐步開放人民的集會結社權，允許多元議題的群眾運動。不可否認，對於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一直到政黨輪替等民主進步之象徵，群眾運動確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俄羅斯的情況卻非如此。如前所述，普欽於2000年上任之後，不但逐步控制俄羅斯內部的各大獨立媒體、電視網，甚至還禁止記者報導各種不利於政府的新聞訊息。除此之外，普欽也透過立法，以嚴苛的條件限制國內政黨的成立，賦予政府更大的權限以壓制各種合法的群眾抗議行為，工會與勞工的罷工權也受到許多限制。當媒體的公正性遭到政府的打壓，而民眾也無法透過自發性運動來表達本身的不滿時，俄羅斯的民主也就逐漸倒退，回到過去的威權政體。
- 5.有無健全發展的政黨體系：許多民主國家未能鞏固的原因，問題不在於政黨數目的多寡，而是政黨制度化的程度。Mainwaring 提出有關政黨制度化的四個條件是：1.制度化的政黨具有穩定性，而且政黨間的競爭有規則可循；2.制度化的

註⑭ 詳見龔耀文，「毫無懸念的俄羅斯大選」。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4-3-14/LT4-238730.htm，以及劉天白，「美專家談蘇聯解體：俄羅斯人付出代價」。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2/29/content\_2391129.htm。

註⑮ 詳見王銀泉，「美印俄三國中產階級調查：照樣也為生活愁」。http://big5.ce.cn/xwzx/gjss/gdxw/200409/13/t20040913\_1745250.shtml。

註⑯ 請參考 Schedler, "Measur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p. 84~85.



政黨植基於社會中，政黨與公民間的聯結是穩定的；3.政治行動者賦予政黨正當性，並將它視為民主政治的必需品；4.政黨組織係獨立的，不屈服於少數野心勃勃的領導者。<sup>⑬</sup>在民主轉型的準備階段中，台灣明顯的自由化歷程始於 1987 年以來的解嚴、解禁。<sup>⑭</sup>戒嚴令的解除，被視為專制政權宣告修改原有的政治法則，以開放更大的空間，供給個人與團體，行使公民與政治的權利。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國民黨政府雖強調壓制反對勢力及個人自由，但並未以激進的手段來消除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界。由於威權主義容忍經濟、宗教及其他自由的發展，因此，在自由化開始後，台灣向來的文化、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基礎，能夠做為政黨體系有效運作的憑藉。民主進步黨在 2000 年贏得總統選舉，不僅被視為民意終於得以自由、民主地表現出來的結果，亦是一黨專政冗長潰敗過程的終結。<sup>⑮</sup>然而，俄羅斯的情況正好相反。在極權統治時期的俄羅斯，共產黨的政治支配是無所不包的，並透過全面支配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方式，將各個面向予以政治化，以達到掌握全部權力的目的。由於極權主義強烈限制市民社會的發展，故在自由化開始後，俄羅斯長期的文化、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脆弱基礎，不僅無法有效維持政黨體系的運作，更是造成政黨體系功能不彰的主要原因。甚至在葉里欽擔任總統期間，他始終不願意將自己與任何政治派別聯繫在一起，並認為總統這一職位應高出於骯髒的政黨政治，致使政黨在俄羅斯的發展中確實帶來很多混亂，也給許多政黨政治的支持者帶來了不小的困難。<sup>⑯</sup>因此，目前俄羅斯憲法所揭示的多黨政治，僅是以多黨的外貌來裝飾其「一黨優勢」的實質。<sup>⑰</sup>其實政黨乃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基礎，甚至有助於維持國家的凝聚力。真正的政黨政治可以促進穩固的統治，如果在民主制度之下擁有一個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加上經常舉辦的自由與公平的選舉，將有助於普欽把俄羅斯治理成更安全的國家，而非進一步向威權主義的方向倒退。<sup>⑱</sup>

做為新興民主國家，台灣在政治發展與民主化過程中，可能無法完全避免政治發展危機論所強調的國家認同危機、政府合法性危機、政治參與危機、分配危機及行政命令貫徹危機等。<sup>⑲</sup>然而，上述威脅是否可能造成民主腐蝕或崩潰，則有待進一步觀

註<sup>⑬</sup> 請參見 Scott Mainwaring, *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Brazil* (Stanford an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27.

註<sup>⑭</sup> 請參見李西潭，「邁向先進的民主：二十一世紀台灣民主化的展望」，頁 52。

註<sup>⑮</sup> 請參見 Solinger, *op. cit.*, p. 41.

註<sup>⑯</sup> 請參見 Howard J. Wiarda, *Comparative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Fort Worth, Tex.: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2002), p. 74.

註<sup>⑰</sup> 參考林永芳，前引文，頁 7。

註<sup>⑱</sup> 參見 Kathryn Stoner-Weiss, *op. cit.*, pp. 113~114.

註<sup>⑲</sup> 所謂危機 (crisis)，是指可能引發社會相當大震撼、且不易透過現有制度予以解決的歷史性嚴重問題。概括言之，政治發展的危機共有五項，即國家認同危機、政府合法性危機、政治參與危機、分配危機及行政命令貫徹危機。請參見 Leonard Binder,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3~73.



察。<sup>④</sup>從「自由之家」的指標與評比來看，台灣民主倒退的威脅似乎已經減退，民主崩潰的危機尚未具體顯現，學者普遍關注的焦點在於民主品質如何提升的問題。<sup>⑤</sup>而當下最重要的民主工程，就是在踏穩民主鞏固第一階段的政黨輪替之後，繼續朝向民主深化而努力，一方面建立憲法、選舉與政黨的制度化，亦即落實「組織民主」的工作，朝著將來不知哪一次大選可能發生的再一次政黨輪替時，能夠順利通過Huntington 提出之檢驗民主鞏固的最低標準「雙翻轉測驗」而努力；另一方面，培養民

註<sup>④</sup> 首先，就國家認同而言，是指境內居民必須對國家整體有共同的認同。在台灣這不僅是一個政治上無法避免的爭議，甚至也造成社會上嚴重的對立。其次，就政府合法性危機而言，由於民主化後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不同需求日益增加，故往往造成執政當局無法負荷的結果。再者，就政治參與危機而言，因為重大的政治事件迭迭發生，加上媒體的過度渲染，已使台灣呈現高度的政治參與。但人民過度的參與，盲目的參與行動，也會造成社會動盪不安，進而削弱政府從事長期性計畫的能力。此外，就分配危機而言，因為「平等」的觀念與要求在民主化後已日漸普及，故社會財富分配的懸殊不均，可能會連帶造成台灣政治上的動盪。最後，就行政命令貫徹的危機而言，民主化後的台灣社會，政黨競爭激烈，進而影響行政體系執行命令的貫徹程度。除了以上這些危機，政府領導人濫權與涉入金權也是民主危機國家共同的問題。請參考自由電子報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oct/16/today-p1.htm>。以上這些危機是否造成台灣自由程度的退步，以致於腐蝕為「選舉的民主」，甚至於崩潰為「威權體制」，仍可藉由「自由之家」每年的評比報告來觀察。

註<sup>⑤</sup> 請參考 Joseph Wong, "Deepening Democracy in Taiwan," *Pacific Affairs*, Vol. 76, No. 2 (2003), p. 235. 而筆者認為在台灣民主鞏固的過程中，必須特別注意下列五項問題：1. 國家認同的歧異；2. 制度化不足；3. 法治精神不彰；4. 人民欠缺民主素養；5. 民主品質不高。首先，就國家認同的歧異而言，因為台灣過去一度是在缺乏國家認同的共識下，建立起民主政治的體制，雖然經歷三次的總統直接民選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但國家認同的問題仍然存在。而且由於對統獨爭議缺乏共識，故每當觸及有關兩岸政策議題時，皆無法理性地辯論與協商，往往陷於政治意識型態鬥爭的泥淖中。請參見李西潭、張孝評，「台灣民主化分析 — Rustow 與 Huntington 模式的檢驗」，頁 68~69。其次，就制度化不足而言，自從 1987 年啓動民主化以來，台灣的自由程度雖不斷提升，但是急遽轉型的結果，使憲法、黨派與選舉制度均有待進一步的制度化。例如：在憲政體制的選擇上，存在著應採行總統制或內閣制的問題。而在國會選舉制度方面，雖然預計在下一屆立委改選時，將現行的「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NTV) 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但相關的配套措施，如選區的劃分等議題，仍然有待規劃。參見 Jih-wen Lin,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Japan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 2 (2006), pp. 118~131. 另外，就法治精神不彰而言，許多研究民主化的學者不約而同地指出，法治的建立與否是民主鞏固的關鍵性條件之一。參見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Toward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2 (1996), p. 6. & Richard Rose and Don Chull Shin, "Democratization Backwards: The Problem of Third-Wave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2 (2001), pp. 335~340. 然而，觀察台灣民主鞏固的情況，雖在修憲、釋憲、行憲的過程中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但是吾人長期觀察台灣社會現象，發現人民闖紅燈的情況似乎有增無減，可藉以判斷法治不彰。正是所謂「無宗教，不成社會；無道德，不成國家；無法治，民主政治無法真正確立與鞏固。」參見李西潭，「民主鞏固概念的爭議」，頁 21。再者，就人民欠缺民主素養而言，解決之道應是培養民主政治的文化。因為台灣社會仍存有許多專制文化的傳統，進而缺乏民主鞏固所需要的容忍、妥協與尊重他人的精神，以及「競爭而不是鬥爭」的文化。故吾人必需致力於透過民主政治的運作與實踐，來加以改善與提昇政治文化的素質。參見李西潭、張孝評，「台灣民主化分析 — Rustow 與 Huntington 模式的檢驗」，頁 63~64。最後，就民主品質不高而言，大多數老牌民主國家都是漸進演變的過程，但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從威權專制轉向競爭性的民主體制卻只有一、二十年的時間而已，民主品質的提升成為民主深化的主要目標。參見 David Beetham, *Democracy: A Beginner's Guide* (Oxford: Oneworld, 2005), p. 83. 畢竟台灣的民主化屬於急遽轉型的個案，自從 1996 年被「自由之家」評比為自由民主國家以來，至今僅有短短十年。因此，在民主品質的表現上，自然無法與歐美等先進民主國家並駕齊驅。

主的文化，提升民主的品質，使台灣能夠穩健地從「自由的民主」國家，邁向「先進的民主」國家之行列，<sup>⑭</sup>最終目標乃是確立民主為台灣社會「唯一的競賽規則」(only game in town)。<sup>⑮</sup>

同樣地，儘管俄羅斯目前出現民主倒退的情況，甚至還被評比為「不自由的」國家。<sup>⑯</sup>然而，普欽仍有機會改變現行的運作方式，若其能夠改弦易轍，重新回到民主改革的大道上，相信有朝一日也能夠提升為部分自由，甚至是邁向自由民主國家之行列，否則其前景可能堪慮。<sup>⑰</sup>因為誠如評價俄羅斯為「缺乏權威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without authority)之學者 Kathryn Stoner-Weiss 所指出的：民主與威權主義的區別主要是前者透過一套機制來對人民負責；而不民主的體系必然會訴諸特殊的方式來淘汰不適任或貪腐的官員。造成俄羅斯無法治理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國家步履蹣跚的民主，而是虛弱、貧窮與制度化不足所造成的。其解決之道乃是普欽應該建立一個比之前的領導者在位時更擴大的民主與更深入的制度化。<sup>⑱</sup>

\* \* \*

(收件：95 年 3 月 21 日，複審：95 年 9 月 13 日，接受：95 年 10 月 31 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sup>⑭</sup> 當然在台灣民主運作過程中，我們也不能忽略一些事件對於台灣民主政治運作上基本政治遊戲規則的負面影響，例如 2004 年總統大選結果的紛擾、公投與大選同時舉行的爭議、國家認同與「族群」問題的炒作、政府、政黨與媒體間的關係、官商間有爭議性的互動方式、府會間的持續緊張與憲政體制究竟應如何運作的爭執等問題。這些問題雖說對於台灣民主體制沒有根本性的衝擊，但是對於一個國家民主品質的提升卻是具有重要的影響。台灣在經過這些年來解除戒嚴、總統直選與政黨輪替等重要事件後，在邁向民主之路上已經大幅前進的過程中，雖說獲得國際的肯定，但我們也必須正視一些在民主發展過程中的瑕疵。在未來不斷提升台灣民主品質的努力中，如何認真面對這些問題，乃是台灣民主在進一步向上提升的過程中，必須認真檢討的問題。本文限於篇幅，留待以後進一步處理。

註<sup>⑮</sup> 參見 Linz and Stepan, *op. cit.*, p. 5.

註<sup>⑯</sup> 普欽在 2005 年初廢除了原本用選舉方式選出的 89 個省的省長，此舉為其民主倒退的具體事證。其實更早之前普欽藉由 2004 年發生的 Beslan 恐怖份子脅持人質事件，以反恐為理由，行中央集權之實。普欽認為中央集權較能更好的治理俄羅斯，以獲得安全的環境。但殊不知此舉反讓俄羅斯背離了民主的道路，腐敗的官員也沒有因此而被淘汰。其實，鞏固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卻反而能夠持續地走下去，因其依賴官僚與組織的能力，而非以強制的方式去確保人民對國家的忠誠。參見 Stoner-Weiss, *op. cit.*, pp. 104~105.

註<sup>⑰</sup> 參見 Shevtsova, *op. cit.*, pp. 75~77. 另外，Michael McFaul 於 2002 年撰寫一篇探討後共產主義國家轉型類型的論文時，俄羅斯仍被歸類在「部分民主」的國家。但從現在（2005~2006 年）的情況看來，俄羅斯後來的民主發展顯然已經倒退回 Michael McFaul 所歸類的獨裁國家。請參見 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54, No. 2 (January 2002), pp. 226~227.

註<sup>⑱</sup> Stoner-Weiss, *op. cit.*, p.106.



## 附 錄

「自由之家」所採用的指標，列舉如下，以資參考。

### (一) 政治權利

#### A. 選舉過程

1. 政治領袖是否透過自由與公平的選舉中產生？
2. 立法代表是否透過自由與公平的選舉中產生？
3. 是否具備公平的選舉法規、平等的競選機會、公平的投票過程以及誠實的陳列選票數目？

#### B. 政治多元主義與參與

1. 人民是否有權依其意願去組織不同型態的政黨或其他競爭性政治團體，且此系統是否允許這些競爭性政黨或團體的更迭？
2. 選舉中是否存在明顯的反對派，有無實質的反對力量，同時反對派有無實質可能經由選舉而獲得權力或增加支持度？
3. 人民的政治選擇是否免於軍隊、外國勢力、極權性政黨、層級性宗教機構、壟斷性經濟組織或其他權力團體的支配？
4. 文化、種族、宗教、以及其他少數團體是否能在政策決定的過程中，透過非正式的共識而擁有合理的自決、自治、自主性及參與的權利？

#### C. 政府功能

1. 自由選出的代表能否決定政府的政策？
2. 政府能否免於普遍的貪污？
3. 政府是否對全體選民負責，且其運作是否公開與透明？

### (二) 公民自由

#### D. 表意與信仰的自由

1. 是否擁有自由且獨立的媒體，以及其他型式的文化傳播管道？（註：某些國家的媒體是屬於國家控制，但是提供多元觀點的話，亦為正面評價）。
2. 是否擁有自由的宗教機構，私密或公開的宗教表達是否不受限制？
3. 是否擁有學術自由，以及教育體系是否能免於政治灌輸？
4. 是否擁有公開與自由的私人討論？

#### E. 集會與結社的權利

1. 是否擁有集會、示威遊行以及公開的討論等自由？
2. 是否擁有組織政治性或準政治性的團體之自由？（註：這包括政黨、公民組織、以及議題團體等）
3. 是否擁有自由的貿易聯盟及農業組織，且其間能否進行有效的集體協商？專業人員及其他私有組織是否擁有自由？

#### F. 法治

1. 是否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
2. 法治是否能戰勝犯罪事件？警察是否直接由文官控制？
3. 任何團體不論支持或反對，是否能夠免於政治恐嚇、非法拘禁、放逐、刑求的



威脅？以及能否免於戰亂的自由？

4.法律之前，是否人人一律平等？

G.個人自主性與個人權利

1.個人是否擁有自主性？國家是否控制居住與遷徙、就業機會選擇？是否免於對國家過度的教化與依賴的自由？

2.公民是否有權擁有財產及建立私人企業？政府官員、安全制度、組織性犯罪是否過度影響了私人商業行為？

3.是否擁有個人的社會自由，包括性別平等、選擇婚姻伴侶以及組織家庭規模的自由？

4.是否擁有機會平等且免於經濟剝削的自由？

( 詳細內容請見下列網址：<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4/methodology.htm> )





#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Breakdown: Observations on Russia and Taiwan ( 1995~2005 )

*Yeau-tarn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Sun Yat-sen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Both Taiwan and Russia became democrac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However, the results of democratization for each turned out to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5-2005.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relevant ideas is clearly explained in the first section, also showing the process of Taiwan and Russia's democratic developments. In addition, model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 of both countries' democratization are used. Finally, observations on Taiwan'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Russia's democratic breakdown are offered.

**Keywords:**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democratic transitio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democratic breakdown; Taiwan; Rus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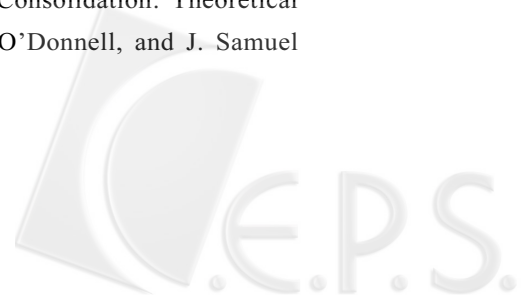


## 參考文獻

- 中國時報，2000 年 3 月 22 日，版 5。
- 王定士，「俄羅斯千禧年總統選舉研究」，**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8 卷第 2 期（2000 年 12 月），頁 35-62。
- 江炳倫、吳文程，「國民黨政治角色的轉換」，**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制度與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2 年）。
- 阮銘，**民主在台灣**（台北：遠流，2000 年）。
- 阮銘，**民主台灣 vs. 共產中國**（台北：玉山，2001 年）。
- 李西潭，「從民主化相關概念探討台灣民主轉型的歷程－兼論孫中山建國三程序的意義與作用」，**政治學報**，第 29 期（1997 年），頁 141-192。
- 李西潭，「邁向鞏固的民主：台灣案例」，**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5 卷第 2 期（1997 年 12 月），頁 161-196。
- 李西潭，「邁向先進的民主：二十一世紀台灣民主化的展望」，**「跨世紀的政治願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1999 年），頁 43-65。
- 李西潭，「民主鞏固概念的爭議」，**台灣政治學會 2002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政治學會，2002 年），頁 1-26。
- 李西潭，「全球化、民主化與兩岸未來」，**2003 年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03 年），頁 169-191。
- 李西潭，「台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民主的未來」，**2005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台灣民主的挑戰與前景」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05 年），頁 1-27。
- 李西潭、張孝評，「台灣民主化分析－Rustow 與 Huntington 模式的檢驗」，**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0 卷第 2 期（2002 年 12 月），頁 45-87。
- 李西潭、張孝評，「民主化與台海和平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4 期（2004 年 7-8 月），頁 1-34。
- 李國雄，**比較政府與政治**（台北：三民，2004 年）。
- 林永芳，「俄羅斯政黨體系與民主化」，**「2005 台北莫斯科論壇：全球化下的台俄關係」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2005 年），頁 1-7。
- 林佳龍，「解釋台灣的民主化」，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與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1999 年），頁 87-152。
-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台北：五南，2000 年）。
- 吳玉山，「半總統制下的內閣組成與政治穩定－比較俄羅斯、波蘭與中華民國」，**俄羅斯學報**，第 2 期（2002 年），頁 229-266。
- 倪炎元，**東亞威權政權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台北：月旦，1995 年）。
- 馬什（Christopher Marsh），「後共產黨時代的艱難旅程」，**二十一世紀評論**，第 85 期（2004 年），頁 18-28。
- 郭武平，**俄羅斯的政黨政治**（台北：五南，1999 年）。
- 陳義彥、陳陸輝，「政治功效意識、政治信任感以及台灣選民的民主價值」，《2001 年

- 選舉與民主調查研究研討會》，台北：「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2001年。
- 畢英賢，**俄羅斯**（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年）。
- 趙竹成，「俄羅斯聯邦總統的權力與角色」，**理論與政策**，第16卷第2期（2002年），頁47-64。
- 劉向文，**俄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2002年）。
- 蔡玲、馬若孟，羅珞珈譯，**中國第一個民主體系**（台北：三民，1998年）。
- 蘇子喬，「我國『雙首長制』為什麼不會換軌？——制度因素之分析」，**政治學報**，第40期（2006年），頁41-84。
- Beetham, David, *Democracy: A Beginner's Guide* (Oxford: Oneworld, 2005) .
- Binder, Leonard,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
- Breslauer, George W., *Gorbachev and Yeltsin as Lea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Carothers, Thoma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1 (2002), pp. 5-21.
- Chao, Chien-min and Yeau-tarn Lee, "Transition in a Party-State System: Taiwan as a Model for China's Future Democratization," 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210-230.
- Cheng, Tun-Jen,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 41 (1989), pp. 471-499.
- Chu, Yun-han, "Taiwan's Unique Challeng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1996), pp. 69-82.
- , "Taiwan's Year of Stres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No. 2 (2005), pp. 43-57.
- Chu, Yun-han, Larry Diamond, and Doh C. Shin, "Halting Progress in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1 (2001), pp. 122-136.
- Clarke, Paul Barry and Joe Fowerake, eds., *Encyclopedia of Democrat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 Collier, David and Steven Levitsky,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49 (1997), pp. 430-451.
- Dahl, Robert A.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 , *On Democrac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DeBardeleben, Joan, *Russia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7) .
- Diamond, Larry, "Is The Third Wave Ov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1996), pp. 20-37.
- , "Introduction: In Search of Consolidation,"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Yun-

- han Chu, and Hung-mao Tien, 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p. xvi-xx.
- Diuk, Nadia, "The Next Gener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 2004 ), pp. 59-66.
- Gunther, Richard,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and Hans-Jurgen Puhle, "O'Donnell's Illusions: A Rejoind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4 ( 1996 ), pp. 151-159.
- Heywood, Andrew, *Politics* ( New York : Palgrave, 1997 ).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
- Karatnycky, Adrian,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 sand Civil Liberties* (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7 ).
- ,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 sand Civil Liberties* (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8 ).
- ,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 sand Civil Liberties* (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9 ).
- ,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 sand Civil Liberties* ( New York: Freedom House, 2000 ).
- ,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 sand Civil Liberties* ( New York: Freedom House, 2001 ).
- ,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 sand Civil Liberties* ( New York: Freedom House, 2002 ).
- ,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 sand Civil Liberties* ( New York: Freedom House, 2003 ).
- , "The 2003 Freedom House Survey: National Income and Liber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1 ( 2004 ), pp. 82-93.
- Levada, Yuri A., "What the Polls Tell U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 2004 ), pp. 43-51.
- Lin, Jih-wen,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Japan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 2 ( 2006 ), pp. 118-131.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Toward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2 ( 1996 ), pp. 14-33.
- ,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McFaul, Michael and Nikolai Petrov, "What the Elections Tell U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 2004 ), pp. 20-31.
- Mainwaring, Scott,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Issues,"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 Valenzuela,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2), pp. 294-341.
- , *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Brazil* (Stanford an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cFaul, Michae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54, No. 2 (2002), pp. 212-244.
- Monshipouri, Mahmood, *Democr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 Human Rights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 O'Donnell, Guillermo,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2 (1996), pp. 34-51.
- , "Illusions and Conceptual Flaw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4 (1996), pp. 160-168.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iano, Aili and Arch Puddington, "The 2005 Freedom House Survey: Progress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 1 (2006), pp. 119-124.
- Puddington, Arch and Aili Piano, "The 2004 Freedom House Survey: Worrisome Signs, Modest Shift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No. 1 (2005), pp. 103-108.
- Rose, Richard and Don Chull Shin, "Democratization Backwards: The Problem of Third-Wave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2 (2001), pp. 331-354.
- Rustow, Dankwart A.,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 3 (1970), pp. 337-363.
- Ryzhkov, Vladimir, "The Liberal Debat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2004), pp. 52-58.
- Schedler, Andreas,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 2 (1998), pp. 91-107.
- , "Measur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6, No. 1 (2001), pp. 66-92.
- Schmitter, Philippe C.,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 in Richard Gunthe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and Hans-Jürgen Puhle, eds.,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84-314.
- Schumpeter, Joseph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1976).
- Sestanovich, Stephen, "Force, Money, and Plur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 (2004), pp. 32-42.
- Shevtsova, Lilia, "The Limits of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2004), pp. 67-77.
- Shin, Doh Chull, "O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A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47 (1994), pp. 135-170.
- Solinger, Dorothy J., "Ending One-Party Dominance: Korea, Taiwan, Mexico,"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1 (2001), pp. 30-42.
- Sorensen, Georg,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2nd e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 Stoner-Weiss, Kathryn, "Russia: Authoritarianism without Author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 1 (2006), pp. 104-118.
- White, Stephen, "Russia's Troubled Transition," in David Potter, David Goldblatt, Margaret Kiloh and Paul Lewis, eds.,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pp. 421-42.
- Wiarda, Howard J., *Comparative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Fort Worth, Tex.: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2002).
- Wong, Joseph, "Deepening Democracy in Taiwan," *Pacific Affairs*, Vol. 76, No. 2 (2003), pp. 235-256.

